

继续革命著作选读

学生读本



谨以此书纪念

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逝世四十六周年

献给

所有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成长、战斗和牺牲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同志们

**Continu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Selected works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

继续革命著作选读

学 生 读 本

上海反到底战斗兵团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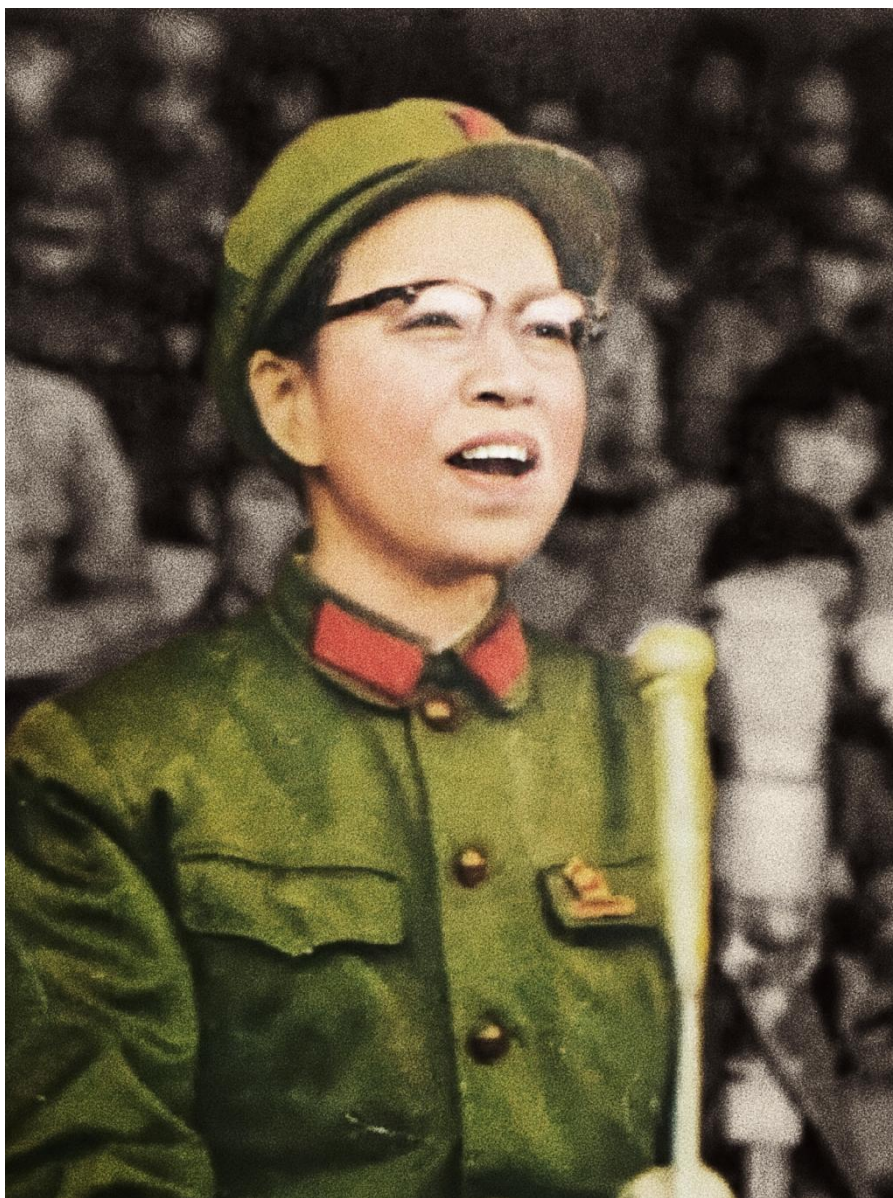
毛 泽 东



王 洪 文



张 春 桥



江 青



姚文元

毛主席语录

如果我们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出版说明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过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残酷的现实所打醒，他们自发地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为了适应广大工人阶级及革命青年学习马列著作的迫切需要，我们参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马列著作选读（战士读本）》选编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等关于继续革命的重要著作、重要谈话共 37 篇。本书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广泛参考群众意见等原因不免出现疏漏，恳请读者谅解。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

目 录

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9
姚文元 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17
姚文元 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23
姚文元 略论辩证法、片面性和折衷主义·····	28
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37
人民日报编者按·····	37
正文·····	38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39
一个假海瑞·····	42
《海瑞罢官》怎样曲解了阶级关系·····	44
《海瑞罢官》宣扬了甚么?·····	48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甚么东西?·····	51
毛泽东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58
(一)·····	58
(二)·····	59
(三)·····	71
毛泽东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73

毛泽东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75
毛泽东 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77
毛泽东 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1
(一)	82
(二)	82
(三)	83
(四)	83
(五)	84
(六)	85
(七)	85
(八)	86
(九)	86
(十)	87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9
一、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89
二、主流与曲折.....	90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90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91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92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93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93

八、干部问题·····	94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	95
十、教学改革·····	96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96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	97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	97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	97
十五、部队 ·····	98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	98
姚文元 评《三家村》 ·····	100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	103
一条黑线几股黑风 ·····	106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	121
退兵时的策略 ·····	127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	130
两报一刊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	133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	140
(二)	140
(三)	141
(四)	141
(五)	142
(六)	142
阿尔都塞 论文化大革命	147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分析	149
A)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149
B)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标	153
C) 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和方法	155
二、文化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	158
A)	158
B)	160
C)	161
D)	163
E)	166
张春桥 接见上海工总司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170
姚文元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181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181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186
三、掌握斗争大方向	193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198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210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216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220
张春桥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225
江 青 为人民立新功	249
姚文元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262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265
在大风大浪中暴露	280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	286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93
姚文元 评陶铸的两本书	305
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理想”	307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世界”	313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320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326
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322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40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340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349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354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358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361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362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关系	366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375
毛泽东 我的一点意见	377
毛泽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379
毛泽东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	388
张春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06
关于九大路线	406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409
关于形势和任务	414
王洪文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23
毛泽东 关于《水浒》的评论	431
姚文元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432
张春桥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46
王洪文 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456
张春桥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464
毛泽东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473
毛泽东 论反对修正主义	479

毛泽东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487
江 青 我的一点看法	493
Edith B 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理论是	
对马列毛主义的重要贡献	500
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	501
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必须以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中心	512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如何进行的？	518
四、资本主义复辟无法阻止，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	
反复辟加以否定	524
五、结论	528

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革命法权思想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本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

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

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

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

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淨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淨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

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

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姚文元

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有些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心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定会出懒汉。在有觉悟的劳动人民看来，这固然是杞人之忧，不堪一驳；但在头脑里还有一块生长个人主义思想土壤的人，对此一说却颇感兴趣，并且还以己度人，以为别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懒下去。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他们说：“人的欲望无穷，按需分配将会乱成一团。”他们说：“一个人肯努力工作，总要有的一种刺激，例如名誉、地位、等级……等等，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了，谁还肯努力工作？”……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我们很有认真加以讨论一番的必要。

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出懒汉的人，总是把懒惰当作一种和社会条件无关的人类共性，好像人生来就是有一种好逸恶劳的懒惰脾气，只是因为自己吃得好穿得好或有名利的刺激，才肯被迫地参加劳动，此二者一去懒惰就必然来了。他们自己头脑中是这样想的，就推己及人，以为别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了解到，正是他们自己头脑里这种观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夏虫不可以语冰”，如果不改变这种剥削阶级对劳动的看法，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有觉悟的工农就从来没有担心过什么懒汉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好逸恶

劳”“按酬付劳”这种想法，推己及人，就自然觉得共产主义社会里，大家一定都把自觉的劳动当作生活的准则。

我们要公开地坦率地向“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者说：懒惰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或“人类性格的弱点”——如果有人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当做是“人类性格的弱点”一样。懒惰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少数劳动人民中间的懒惰习气是受了剥削阶级厌恶劳动观念的影响。你们说共产主义必出懒汉吗？恐怕你们自己对不劳而获就还有些羡慕吧！有一位先生想象共产主义社会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资本家的生活，每天只工作半小时，剩余下的时间各人按自己的兴趣去玩，没有什么约束，钓钓鱼，抽抽烟，一张沙发，一壶热茶，一盆点心。其乐赛神仙，人间天堂，此之谓也。”——这完全把共产主义社会设想成一个懒人的社会了。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资本家一样的生活，我们要别人做资本家就行了，何必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影响？实现共产主义，何必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的，未来的物质生活水平会超过资本家。但共产主义的生活永不会成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生活，艰苦朴素仍将作为一种美德。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文化水平和高度自觉的劳动是永远不能分开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是提高，共产主义的劳动者越是觉得为大家劳动得更好一些，是多么的幸福，光讲享受是多么的可耻，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劳动而谈共产主义是一点都不懂得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也不懂得幸福美满生活的实质。至于把共产主义社会想象为无政府主义，那也是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空想。共

产主义社会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纪律和自由的关系的共产主义的方法，舍弃哪一面都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按照自己个人主义的愿望用无组织，无领导，无集中的无政府状态来歪曲共产主义，我们要注意。

把话说回“懒汉”上来。从猴子(科学的术语叫“猿”)变成人就是因为劳动。人为什么会有一双手呢？不是为了数钞票，不是为了躺在沙发上去拿“一杯热茶”；在猿猴时代大概是没有钞票，也没有热茶的。手的形成来自于劳动，也正是为了劳动。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他还是劳动的产物，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是懒汉，大概就没有我们这些子孙了。所以劳动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个和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人类其他方面能够发展的根本条件，只要是人就应该劳动，就应该把他的两只手使用在劳动上。在原始公社制的时候，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没有劳心劳力的对立。人就没有懒这个观念，生活在原始公社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生活当然很苦。但不知懒惰为何物，生活中没有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就不可能出现一批“热爱”懒惰的懒汉，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后来有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产生了剥削和劳动的对立。才出现了懒汉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懒惰，民间故事中才出现了各种讽刺懒汉的形象。劳动人民中间少数的懒惰习气，正是由于生活中存在着一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寄生虫而来的。

中国人民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中华国土，创造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封建社会中最懒的是穷奢极宜的地主阶级和

大商人，这一点是封建阶级较有见识的人是也承认的。“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富豪不是天下最懒的人吗？“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的那批奇形怪状的大少爷们不是懒到连四书五经这些封建阶级视为“经典”的书也不愿意读，懒到连作诗也要请人捉刀吗？许多皇帝是天字一号的大懒汉，他可以懒到早朝也不做，“春宵苦短日高起”日夜过着他荒淫无耻的生活，有些“放达”之士以懒为风。想以懒散与朝中势力相对，酒与懒常常就合而为一。即使诸葛亮，在隆中高卧之时也何尝不带些懒气，鞠躬尽瘁，是在他做了刘备的军师之后。俄国岡察洛夫创造出一个奥勃洛摩夫，可谓集地主阶级懒性之大成。他懒到根本不想从床上爬起来了。千事万例，不都说明了“好逸恶劳”是剥削阶级的一种性格；而决非什么“人类共性”吗？而懒的根本原因是脱离生产劳动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心在剥削，家财万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人就必然懒起来。地主阶级是如此，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资本家有了洋房，懒起来可以躺在沙发上数钞票。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自由化”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懒，他们总希望生活不要太“紧张”，不要集体化，也不要战斗化，留出时间可以“懒”下，懒得舒服一些，一个人整天躺在床上打打呵欠，念念唐诗，“其乐赛神仙”，和劳动人民生活绝缘...由此看来，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正为了消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懒汉，怎么反而说共产主义要出懒汉？黑白颠倒，岂不妄哉！

肯定地说，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能够极大的提高。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经过许多次的思想斗争，但一定会做到。在人民内部，是自觉地改造，通过参加劳动和批评，克服各种轻视劳动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少数有懒汉思想的人，将会根本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由于他生活方式改变，他的思想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改变。对于反革命分子及杀人犯、盗窃犯、骗子、流氓...及其他坏分子，则是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要经历一个从强迫到自觉的过程。花岗石头脑的人自然也会有的，这极少数死守住头脑里白旗不放的人，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可以想像一下；多少年之后，全中国人民都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生活中没有一个非劳动者。从这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把劳动和学习、吃饭一样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就同不吃飯要饿肚子一样，不劳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们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自觉地忘我地为社会劳动，根本就不知“名誉，地位”之类为何物，不知私有制为何物，也不知“懒汉”为何物。如同他们只有从博物馆中才能见到老鼠一样，他们只有从历史、文艺书中才能看到懒汉的形象。他们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劳动，他们感到最大的幸福就是用劳动为人类创造新的财富，使别人得到更多的幸福。一在这种情况下，懒汉不是就被彻底消灭了吗？

“南海圣人”康有为也很怕共产主义出懒汉，他在“大同书”中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中有“四禁”，“第一禁懒惰”，这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时候的人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也不懂得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条原理。他究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理解一种社会现象产生和消灭的必然性。

当然,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都没有了。那时也还有先进、落后的矛盾,还有劳动得较好与较差的人,还有思想斗争,还有发展,还有变革,还有革命。然而在集体生活中,形势逼人;任何一个落后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停留在落后状态做“懒汉”,集体的力量,思想、道德的力量,是这样巨大,很快会逼迫落后的人走向进步。在“兄妹开荒”中,妹妹一唱“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床上作懒虫?”哥哥立刻就拿起锄头上山岗了。这还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何况共产主义?可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懒汉,到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肯定消灭了。

这样,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懒汉”,也将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而消灭。从月前看,自觉的忘我的劳动态度,作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正在大跃进中飞速地成长起来。这里我们得到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是:“只有彻底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懒汉。”——和“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者针锋相对,完全相反。

1958年10月13日

姚文元

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下乡劳动的杂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写完了写完了“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之后，就下乡到七一人民公社参加第二战役的劳动去了。劳动对自己是改造，也是教育，打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懒气。越是同农民在一起，就越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荒诞与可笑，那些瞧不起劳动的资产阶级数授学者们，如果请他到田里、河边来试一试身手，准会出不少洋相。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米饭，并不是变魔术那样可以一变变出来的，这是劳动人民多少辛勤操作的结晶，每一粒米里都凝结着一次次劳动的汗水。有“懒汉”思想的人到田里来劳动几天，就会懂得为什么“好逸恶劳”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而不是什么“人的天性”了。

我们劳动这几天，正好碰上农民们讨论吃饭不要钱的问题，他们讨论现在，也讨论将来，越讨论情绪越高，越讨论干劲越大，其中也时论到会不会出懒汉的问题，我主动地把这个问题提出去问他们，大家马上争先回答，你一句，我一句，争得非常热闹。我觉得农民同志的话很有些启人深思的东西，对于“必出懒汉”论是很有力的反驳，对于我那篇短文也是一个补充。所以再写一篇，特地介绍下贫农、下中农们的些论点：

“为啥我们要懒惰呢?不要瞎三話四!多少年来愁的事情現在根本解决了,我們就可以一門心思搞生产了,越搞越有勁!”

“吃飯不要錢之后,大家都积极劳动,有哈人要懒惰,我們要批评他!大家都批評他,他还敢做懒汉?”

“現在我們是有組織的了,同老底子不一样了,啥人要做懒汉,他的头就抬不起来,连老婆也要反对他!”

“我們妇女是不会做懒汉的,要么是出在你们男人堆里。現在生活集体化了,真好呵!你看看我們多出来时间做啥?啥人在困懒党?.还不是搞生产,学文化!.”

“儿女多的人今天吃的是社里的飯,大起来也为社里工作,有什么不公平?从小就是大家养活的,大起来就一定为大家,怎么会做懒汉?”

“生产不起勁的人是会得有的!这种人将来就要狠狠的批评批評,貼他几百張大学报。”

将来的日子具是好得很啦!活到現在没有这样开心过。現在头两年还是要苦一点,后来的日子就越过越好。吃飯不要錢是要靠我們两只手做出来的,啥人不积极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

从以上这些思想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下面几点:

第一,批評与自我批評,是从根本上消灭懒汉的最有力的武器。如果大家都組織起来了,觉悟提高了,大家都热爱劳动,个别想做懒汉的入就沒有他容身的余地,真是“连老婆也要反对他”。大家都瞧不起那种有懒汉思想的人,偷懒成为一种最可耻的行为,少劳多享的行为

就越显得可耻。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有组织的社会,批评、自我批评、大鸣大放、大字报,已经成为每一个人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普遍的办法了。想做懒汉的人也懒不下去,因为懒隋现象已失去了社会基础,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当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已经变为千百万人的道德标准和生活习惯时,就会产生克服一切落后现象的最巨大的力量。贫农、下中农是看到这种情形的,但“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者却看不到,因为他们看不见劳动人民的觉悟,不相信劳动人民的觉悟,只看见剥削阶级中的人现在还有不少好逸恶劳的思想。“井蛙观天”,此之谓也。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消灭懒汉现象是一个不断的思想斗争的过程,并不是自动来到的。在劳动人民内部和外部,这种斗争现在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和“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者的争辩,不就是一种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吗?文艺界中有少数人,总是不大注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在继续这个事实,他们这种看法只会导致放弃思想斗争,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

第二,更重要的,是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是互相推动,波浪相接,不断前进的。思想提高了推动了生产大跃进,办了人民公社,改善了生活;而办起人民公社之后种种好事,又进一步启发了农民的觉悟,感到自己要更好的劳动。生活资料越有保障,生活水平越高,劳动人民在个人生活上操心越少,他们的精力就更多地集中到自己热爱的劳动上去,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就越强烈。放下了愁食愁衣的担子, "就更要求努力搞好生产,不然,吊儿郎当的,就是“对不起

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想想力更强大的嗎?有些“必出懒汉”論者却用剥削阶级的观点,把将来在高度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的按需分配和劳动积极性对立起来,以为前者一出来一定会把后者压下去,这和劳动人民的心思完全相反!农民們深深懂得一切美好生活都是“依靠我們两只手做出来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生活越美,就越想到自己一定要干得更出色,“生活越好,生产越高”,心里唯恐自己劳动得不够,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为什么有些人就没有这种思想呢?

“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論者中間,大约有两种人,一种满脑袋的剥削思想,一贯把不劳而获当作人的天性,不满意人民公社、集体化,自己就想当懒汉的人。这种人根本不相信人会热爱劳动,更不用说不讲报酬、不讲条件的劳动了。他們正是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对象。他們中間有些想做懒汉的人,注定是要落空的,我劝他們早一点自己去参加劳动,多接触接触工人农民,逐步养成劳动的习惯,不要到被别人当作典型来批判时再去改。什么“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論,乘早收起来,摔到垃圾堆里去!还有一些同志,是思想落后于形势,长期习惯用旧眼光来看问题,他們好心好意地想:几千年来人民一直是为衣食而劳动的,工人要活命,就要向资本家斗争,争工资福利。一下子衣食問題都沒有了怎么不会出懒汉呢?同志,你沒有看到今天的社会早已不是过去的社会,劳动人民改造着世界也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改造着自己。今天,全新的共产主义道德,一种不計报酬为公共利益而劳动的态度,正一天天成为万目所睹的新风尚,一天天成为他們性格中最珍贵、最

美好的东西。懒汉思想在劳动人民中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地盘，但它是注定要在斗争中逐渐灭亡下去的，超过长时期的思想斗争；共产主义道德一定会逐渐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观念。“万物变化，固亡休息”（假设），没有永远固定不变的事物。历史的长河中，新的思想不可抗拒地不断更替着旧的思想。昨天认为高额稿费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却认为是不合理的了；今天我写下“下乡”两字是切合实际的，若干年后，当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消灭之后，“下乡”两字也就在生活中消失，只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了。那么，你为什么还用旧眼光来否定日益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精神呢？

1958年11月12日

姚文元

略论辩证法、片面性和折衷主义

——和巴人讨论两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

巴人写了一篇“关于‘两条腿走路’”(见二月五日文汇报“笔众”)的文章,是照他自己的理解,来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法的。但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感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提出来商讨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想谈谈自己这些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他在宣传辩证法的时候,没有把辩证法和折衷主义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没有把辩证法中不可缺少的发展观点讲清楚,没有把全面性和原则性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讲清楚。

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来做文章呢?很简单因为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和静止孤立地看问题毫无共同之处。折衷主义如果从阶级根源(还有认识根源)来说,却常常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能坚定地掌握方向。左右摇摆或把两者折衷,不是科学地加以分析,而是各取百分之五十或各打五十板;只看现状而不看其未来的发展,本质上都是违反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的,都不能科学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

现在我想接触到巴人的几个论点。

巴人說：“辩证唯物主义者总是把‘好’和‘坏’看作对立的统一,并且经过斗争,发展‘好’的,克服‘坏’的,并且善于从‘好’中看出缺点,克服缺点,从‘坏’中看出有利,使坏事变成好事,来推动斗争,这一切也无非是一句话,实事求是。”

这里讲的是好和坏的辩证关系。一看就知道是根据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的。好和坏是对立的统一,这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立统一的意义。我觉得巴人的解释不确切,并不完全符合毛主席原来的精神。毛主席在“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一节中是这样能的;

如象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两者进的都是辩证法,都是讲坏事变好事,但在提法上却有不同之处。

毛主席讲坏事变好事,要从事物的转化来看问题的。他首先明确地区别了两类事:好事和坏事。好事中有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这一个指头,以使克服它,使我们事业发展更顺利更

健康,但不能因为有了缺点就把好事也讲成是坏事,看不到它的基本方面是好的。坏事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出好的结果,这是对立面转化,并非说我们认为坏事本身就是好的。这是我们看出题的原则性。没有这个原则性,就无法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好事和坏事。就没有立场。但事物又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化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反对否认转化的形而上学,反对片面静止地看问题,而主张要同时看见正面和反面,看见两种可能性,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的转化。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全面性。例如帝国主义反动派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是坏事,不能说它本身就是好的,但在这件坏事中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激起了更大愤恨,在这个条件下反动派的镇压这件坏事就必然会转化成它的反面:促使自己更快的灭亡,这自然又转变成好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这种看问题的原则性和全面性的统一。但巴人却不从事物的转化来谈辩证法,而只是平均地说辩证法就是“善于从‘好’事看出缺点克服缺点,从‘坏’中看出有利,使坏事变成好事,来推动斗争”并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事求是”,这用,第一,没有区别“从‘好’中看出缺点”和“从‘坏’中看出有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不区别不同的性质,就容易产生成绩缺点各打五十板的折衷主义。第二,没有讲清楚坏事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引出好的事情,好象任何坏事本身不经过对立面的转化就会“变成好事”;第三,解释“实事求是”不够完整。实事求是是从客观实际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

部規律性,因此,就不但要“善于”在胜利前进时看出“好”中的“缺点”,以便克服它,不犯骄傲自满的毛病;而且还必須“善于”对这种“好”中的“缺点”作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計,分析这缺点是主要还是次要的;是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范围内,原因是什么,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不然,“看”过了头,否定一切,那就仍旧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并且是更大的错误。任何具体真理,在超过了它所反映的内容和适用的范题,就会向它的反面谬误轉化,“善于从‘好’看出缺点”也是如此。讲实事求是而忽略或不讲恰当的分析这一方面,那就是片面的、不确切的。

現在有些人理解的辩证法,并不是从对立面的統一来理解对立面的关系,不讲联系不讲主次也不讲转化,而只是折衷,例如“不可太冷,也不可太热”;“要有干劲,但不能太多;要有科学分析,但不能太过”;“成绩和缺点都都同样讲,强调那一方面是主要都是不对的”;……多么“全面”,多么“不偏不倚”,多么“稳重”呵!如果这就是辩证法,那一切观潮派、庸人,一切甘居中游論者,一切本位主义者,大概世很欢喜这种“辩证法”了,可是这种折衷主义和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化何相同的地方。如果把事物的辩证关系片面化,只看到一个侧面、一种可能,而看不到另一个侧面、另一种可能,自然是不对的;但如果复杂的辩证关系就是加起来除二,用不看有主要次要之分而平均对待,那辩证法也真太简单了。

巴人说:“从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我們清晰地了解到我們还正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

过在某些方面,包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那么根据上层建筑基础的反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我們所建设的文艺也自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而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文艺。但这并不妨害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毋宁說,在我們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應該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文艺了,或以建设共产主义文艺作为行动纲领来号召了,那无疑是不对头的。”

这段話中間有正确的一面,这就是指出了現在我們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贯彻了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則。的确,就社会制度來說,共产主义只是萌芽,現阶段的任务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不能把两个革命阶段混淆起来而跳越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巴人似乎忘記了我們同时又是不断革命論者,忘記了共产主义因素不是静止,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着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視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巴人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即当前是建設社会主义而不看见,随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那“不过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共产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起来呢?“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題上;我們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又是馬思克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为什么巴人不完整地按照党中央的決議來观察文艺问题,

而只引用其中的一面呢?显然,巴人对共产主义萌芽、因素,认为是不做得加以深刻注意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方面。

我們却与巴人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党中央的決議,我們应当在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充分地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在热烈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当中,也热烈地、正确地描勾共产主义的萌芽,并且帮助这萌芽的发展成长。而如果就思想性來說,更应当发扬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歌颂新人新事,树立鮮明的先进的旗帜,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設。絕不能因为它“不过”是“萌芽”而加以貶低、輕視或忽視。文学作品中如果把当前的生活就写成是共产主义,或者作品中违反了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各项政策,那是庸俗化,自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从思想上歌颂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人新事,反映共产主义的萌芽,那就是正确的。不但要反映,还要充分地反映。我仍然认为周揚同志的說法是正确的“文教事业的物质建設不应当超越經濟条件所許可的范围。文化的思想内容却必須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充分反映人民生活中出現的共产主义因素,表现先进人物的共产主义的風格,这样,文化才能为政治服务,給經濟和政治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起促进的作用。”(195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巴人談到了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这是对的,但他却没有想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而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不只是消极地反映基础,反映生活,鮮明地反映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有力地帮助人民提高共产主义党悟,推动当前社会主义建設,通过人的思

想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所有制的改变,而人們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也正是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之一。

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文学中以什么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巴人认为是“并不妨碍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说出“并不妨碍”什某种“思想因素”存在;我們却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小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阶段論为指导,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則,积极地提出問題:(1)文学作品要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偉大现实,反映具体生活时要根据党在一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政策:不能超越政策的范围,把理想当作现实;但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小停止不前。所以;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去写,应当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去写,才能够真正写得深刻。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就不可能写出这个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偉大时代的偉大现实。(2)文学作品中要有共产主义理想,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創造有鮮明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的形象,用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人民利益而忘我劳动的精神来教育鼓励人民,努力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3)充分反映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因素,要真实又要理想。要真实,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情况,把出現在十年之后的情况写在今天出现;要理想,又要令人信服地表現出它广闊的前途,明确地指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去

支持那将要发生或开始发生的新事物，显示出这些新事物的深远的意义和伟大的生命力，引导人民看到无限美好的明天。巴人所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的“紧密结合”，是不准确的、不合逻辑的。“理想境界”是一种“境界”，那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境界”，这种“境界”是很难在文艺作品中同现实生活“结合”的，创作中不能出现两种不同社会阶段“境界”的结合，应当是共产主义理想同当前发展着的(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统一，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

去年一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今年是继续全面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必须继续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掀起波澜更壮阔的生产高潮，在掌握、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谁都知道，高度的干劲来自高度的觉悟，先进的思想指导下，才有先进的成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迫切要求建成高度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步接一步地实现两个过渡。去年一年中劳动人民中间灼热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冲天的干劲，就是劳动人民要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状况这个本质要求在党领导下的表现。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十分珍贵这种精神，正确地加以反映和发扬，决不应加以忽视、贬低或庸俗化。文学艺术中应当继续反映出群众的冲天干劲，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群众生产热情，而不是从此把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收起来了。巴人文章中，这一点是没有说明白的，他把社会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

(目前仅仅是因素)以及文学艺术中的共产主义精神混淆起来了,他以为社会生活中只有共产主义因素,就是文学艺术中共产主义精神也只能是因素,不能过分强调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是一种违背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我们鼓足更大干劲前进的。

由于篇幅关系,我只能先提出这两点。我觉得,现在的确特别需要正确地宣传辩证法,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因为在新问题面前,尤其是在发展变化很快的新问题面前,没有辩证法,不是片面性,就是折衷主义,或者就是静止孤立地观察某一种现象。我讲了,并不等于自己就学会了,我头脑中当然还有不合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东西,我要继续学习。

1959年2月

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1965 年 11 月 30 日编者按：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

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 * *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有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美，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

余地，宣传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美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扬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善，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假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委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甚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朝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忿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燕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聆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

如何用最敬佩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类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其实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甚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想方设法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叙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侵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很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故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因而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故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本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知人们：虽然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

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仍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侧重刻画了海瑞如作甚民雪恨，大杀赃官。剧本反复宣扬：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本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软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成功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成功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成功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伶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弄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期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太多了。虽然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令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

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平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述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愈来愈高，农民受的剥削愈来愈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份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朝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利害的，是依仗政治权势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团体，另外就是一部份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流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定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份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吞并土地，不能

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和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藏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匱竭,一部份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吞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发了朝野各派地主团体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吞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权势的豪强地主拉拢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本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外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回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由于《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能够回避徭役。官僚地主伺机把想回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侵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份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侵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常常折入于暴贵者,以吞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固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吞并,到达收之莫敢不

与的地步。既严重侵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由于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乃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吞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弄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份子对大地主吞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京大学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应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和缓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和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愈来愈尖锐的阶级矛盾，有益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海瑞罢官》怎样曲解了阶级关系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曲解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也许赎回。这是削弱吞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份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固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样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取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愈来愈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甚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弄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知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和缓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避免吞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全部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弄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样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太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常常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准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

说明自己其实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其实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历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和缓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无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以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照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左右开弓，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其实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团体、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样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述是假的。平冤狱的描述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之前知府

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伺机报复，履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以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太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团体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背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乃至会向农民要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其实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虽然吴晗同志曾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准可有曲解，臆造，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

中海瑞的形象已同公道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甚么关系，只能属于曲解，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知我们：不管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没法使已腐朽衰败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没法和缓农民冤仇的烈火。海瑞以后，松江农民照旧受侧重重残暴的压迫和剥削，吞并、流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眼前，剧本居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喝彩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甚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甚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甚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类观点动身，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履行统治权利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多是超阶级的，决不多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固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团体，由于阶级斗争情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分，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类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出保护地主阶

级专政的范围。任什么时候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类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曲解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赃官的斗争来讲，确切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赃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团体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眼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类现象迷惑过很多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常常利用这类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弹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履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峙，清官和赃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弹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侵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做是自己的救世主。明显，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

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大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可以把赃官污吏一扫而光，就可以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破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份，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穿这类假象，破除这类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类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类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什么不告？在平冤狱的进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可以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可以为民雪恨，就可以平反冤狱，使农民取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弹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扬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可以取得解放了吗？

这类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甚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点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历来没有给农民带来甚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完全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同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没法颠覆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比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腐观点，究竟是为何？究竟是对谁有益？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甚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衰败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和缓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保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勇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团体或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

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全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保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晓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动身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述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甚么海瑞爱惜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乃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权势的英雄，这是完全曲解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二者到底还有甚么区分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讲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负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弄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睦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类官书上的记载，明显包括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分，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

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其实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一个阶级，如果依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睦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末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开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最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彭吹甚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类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写，我们只要想想：在解放之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暴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依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甚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

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讲，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背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成功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绝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甚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类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类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甚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桎梏，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甚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一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样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末，《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期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侧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横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

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类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本源和思想本源，需要长时间的斗争才能根本清除。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一个阶级？对哪一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不管甚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甘心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甚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乃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类傲骨去弄甚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甚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忘记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

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由于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动身，采取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动身，勇于坚持毛病到底，勇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勇于把不同意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何《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宣传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扬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期某些人物的良好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份。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动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份，那还要甚么学习毛泽东思想，甚么思想改造，甚么同工农兵结合，甚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甚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甚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宣传甚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

恢复地主富农的罪行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甚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末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类或那种情势反应出来，在这位或那位作家的笔下反应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类阶级斗争的一种情势的反应。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类分析，那末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曲解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甚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其实不是芳香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类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入教训。

毛泽东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上海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

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一个长时期了。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

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

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

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

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

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

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

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

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

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

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

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毛泽东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

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引者注）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引者注）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指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引者注），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杭州——引者注）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引者注）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引者注），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

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注），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5

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引者注），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

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 1911 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

毛泽东

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 1966 年 2 月 12 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 1965 年 9 月至 10 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

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 这个提站点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

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

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

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1966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

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是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 （一）好的。
- （二）比较好的。
-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

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姚文元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

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核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恶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史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

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麼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

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

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

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

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

“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

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绶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恶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恶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

“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恶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

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来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大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

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

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阴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

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

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

“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

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

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吴晗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

“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

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三——六四年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头脑中”“还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

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

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

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

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魑魅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原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红旗》1966 年 7 期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开始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开始了。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在整个地球上燃烧起来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七亿中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着阿尔巴尼亚人民，以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树立了一面鲜红的社会主义旗帜。

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反美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榜样。

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尼等等国家的人民，正在走上和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

西欧、北美、大洋州的无产阶级，正在觉醒起来，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的斗争。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荡涤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全世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为着创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以革命首创精神，在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世界里，经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树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个国家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光荣业绩，都浸透着十月革命英雄儿女的血汗，闪耀着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今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深深地怀念十月革命的伟大缔造者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开创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引为自豪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时代那个欣欣向荣的苏联，由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已经改变了颜色。曾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光明和希望的强大的红色堡垒，在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

现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叛徒居然厚着脸皮，以十月革

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打起“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这简直是对伟大列宁的莫大侮辱，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莫大侮辱，对伟大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你们这一伙十月革命的叛徒，有什么资格纪念十月革命？你们只配站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亿万革命人民的审判！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践踏了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把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劳动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把十月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又处在—批卑鄙工贼—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断送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披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外衣，用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和口出竞争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在“全民文化”的掩护下，大肆宣扬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丑恶的“西方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今日苏联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列宁和斯大林亲自培育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世界无

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跪倒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你们到处兜售修正主义的鸦片，麻醉人民群众，出卖革命利益，破坏革命斗争，使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屠杀。

你们这一伙叛徒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苏联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伟大的、英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七亿中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气势磅礴的伟大斗争，在国际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一定将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能够胜利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说：

“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一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这些伟大的科学预见，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今天一切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列宁这些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向现代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在阐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列宁这些话。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

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只

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革命的普遍规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通规律。尽管今后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正如列宁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斯大林说：“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就象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同时也是国际性的革命。这场大革命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支持。它的伟大胜利，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在人类发展史上，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进的革命理论，总是伴随着由这个理论所指导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得到广泛的传播的。五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世界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进一步地、大大地改变了世

界的面目。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现，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剥削阶级的各种威风扫地。这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震动了世界，使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

世界革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使当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使革命的人们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严格界限。现在，人们再回过头去瞧瞧赫鲁晓夫及其门徒在工人运动后院的粪堆上所摆设的那些旧货摊，对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什么是反十月革命的道路，就看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叫嚣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把无产阶级专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小丑们，再要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去欺骗人民，越发困难了。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议会迷们，再要阻挡无产阶级起来用武装夺取政权，越发困难了。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十八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更高阶段上的继续。今天，我国人民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人民，并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就说过：“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暂时插曲。我们坚信，由伟大列宁和斯大林所教养的、有着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经过了反法西斯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真正的苏联

共产党人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苏修叛徒集团骑在自己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一定会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继承列宁、斯大林的遗志，坚持长期斗争，冲破重重黑暗，使十月革命的红星，重新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总是要革命的。人民群众总是要胜利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下，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最后的胜利。

《红旗》一九六七年十六期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路易·阿尔都塞

论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一个共产主义者，无论他站在哪一边，都不能不经审查就直接把中国的文革当作诸多事实中的一个，当作诸多论争中的一场来“对待”。

不能一上来就把文革当成一场论争。它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它是和别的事实不一样的事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不能归结于形势，这个决定的作出，与中国共产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或应对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包围无“关”。这是一个历时长久且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它代表着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一个转变。它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过去，并准备着自己的未来。它就这样作为整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因此，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必须就它本身，从它的独立性和深刻性来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把它化约为当前形势的某个方面。

另外，它还是一个例外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它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它引起了巨大的理论兴趣。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直说，有绝对的必要给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下层建筑提供相应的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

建筑。为此，有必要来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一场发生在群众的意识形态中的革命。这个论点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列宁曾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必要性，而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方向上也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苏联把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提上政治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一些全新的手段，第一个自己走上并使群众走上了这条道路，第一个把这种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他们称之为“文革”——提上议事日程。

一个直到目前为止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点与作为这个理论论点之实现的全新历史事实之间的这种趋同，显然不可能让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动于衷。这种趋同只能激发一种巨大的兴趣，政治的和理论的兴趣。

当然，这个事件的新颖性、首创性和形式上的出乎意料，少不了会使人惊讶、让人张皇失措，并激起各种疑问。不这样才怪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事先严肃的研究，绝不能妄下结论。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像我们这样远离事件，就无法对文革表态；从而，至少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自己掌握的原始

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文革的政治和理论依据进行分析，就无法对它作出评判。

这意味着：

1) 首先，必须把文革当作一个政治事实来分析，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同时考察：

- 它所介入的政治形势；
- 它所确立的政治目标；
- 它所获得、运用的手段和方法。

2) 其次，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这个政治事实，同时要问这个政治事实是否符合这些理论原理。

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分析（这里只是一个纲要），一个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就不可能对文革作出评判。

1. 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分析

a)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在官方声明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了文革的根本政治原因（参见中共中央总结的“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社论）。

社会主义国家，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仍然存在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半途而废，向资本主义倒退？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1966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社论①）

文革就这样毫不含糊地被当作对一个特别明确的政治问题的政治回应。这个问题被称为“尖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是怎样一种形势呢？

从本质上讲，这并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全球”形势：由美国对南越解放运动的侵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对中国所发起的威胁等等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不对，引发文革的那个形势本质上在社会主义内部。

但这一形势本质上也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这一“冲突”对于文革来说，是相对边缘的。文革首先并不是对这一“冲突”（即由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挑起的论争）的“回应”。文革所回应的是另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上述冲突只不过是那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后果。

文革的形势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难题构成的。当中国共产党说“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时，他们谈论的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荐自己的“解决办法”，也没有邀请这些国家参加文革。但是同样很清楚的是，文革的形势并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通过中国的形势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势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中国的形势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要面临的形势的一个特例。

要理解这个构成了文革政治形势背景的至关重要的根本难题，就必须到这个难题出现的地方去寻找它。我们切不可误判形势。我们切不可在“全球”形势（即帝国主义侵略）或“中苏两党冲突”的形势中寻找这一难题，而必须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中，或更一般地，部形势中寻找这一难题。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发生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虽然在不一样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政权，但最终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又发生了经济革命（对生产资料进行了社会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因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且一旦时机成熟，这个国家就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包括“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成功和失败、困难和成就、以及革命在各个国家中的进展（包括苏联、中欧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的批判性审视表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那怕它“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已经、正在或即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即两条“道路”的难题。

这个难题就是以下难题。我们将以一系列问题的形式把它提出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革命转变的各个阶段，难道不存在“倒退”的客观危险吗？这种危险难道不是取决于革命党（不仅在总路线中，而且在其具体的施行中）所遵循的政策，取决于这个政策的正确性或错误性吗？这种危险难道不是取决于决定各目标的方式，取决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层级关系和相结合的方式，取决于这个政策所确立的各种客观机制（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机制）吗？难道不是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和必然性，即这些机制有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倒退”吗？此外，难道这一危险不

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帝国主义所拥有的各种手段（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由于帝国主义可能从社会主义国家某些要素中所获得的支持，而进一步增加了吗？因为帝国主义会通过填补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空白（比如意识形态），通过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那些机制，将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中立化，使它为自己所用，从而在经济上统治这些国家。

根据这一普遍存在的风险，借用中国共产党当前所用的语言，我们可以问：仅仅因为一个国家完成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就能百分之百得到保证，也就是说，决定性地得到保证，没有反复了吗？这个国家就不会向资本主义“倒退”了吗？

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这种倒退的例证（南斯拉夫）吗？

因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可能在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某些或一些外部（经济的、政治的）形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形式）的同时，却赋予其截然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资本主义复辟的机制），从而任由帝国主义逐渐在政治上将自己中立化，然后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最终在经济上统治自己吗？

这个难题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个论点是一致的。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普遍的论点，才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今天），这种选择变得尤为关键。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有两条道路摆在它们面前：

——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带领人们超越已经获得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并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

——倒退的道路，这条道路带领人们从获得的成就上后退，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被帝国主义中立化并被其利用，进而在经济上被帝国主义统治和“消化”：这也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的道路。

于是，两种道路的选择就是：要么“半途而废”，也就是说倒退；要么不“半途而废”，也就是说，继续前进。

在中国的官方文本中，前一条道路被径直定性为是“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也就涉及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而第二条道路被径直定性为“革命的道路”。

以上就是文革的政治形势所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难题。

b)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标

对中国而言，文革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虽然是对中国而言：但很显然，这一解决办法，正如这个难题一样，在其意义和后果两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说的：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选择：要么半途而废，事实上这样就意味着尽管我们说着相反的话，但是还是选择了倒退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我们继续前进，采取必要措施，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恰恰在这里，文革介入到了中国的形势中来。

中国共产党宣布，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了保证它的未来，并时刻防止它不冒任何倒退的危险，必须为之前政治的革命

和经济的革命补充第三种革命：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群众的意识形态，用一种新的群众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取代仍然弥漫在中国社会群众中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种途径，给社会主义的经济下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提供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这个最终目的规定了文革的远期目标。文革只能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然而，从今以后，这一最终目的就与这个形势的根本性的、占主导地位的难题——十字路口的难题、两条道路的难题——结合在了一起。在确定当前各目标层级关系的中国官方文件中，这种结合清楚地突显了出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文革应当从党内、从决定一切的党自身开始，并在其他所有领域同时展开。文革单刀直入地向领导干部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他们要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的问题。

这一根本目标毫不含糊的指明了文革所要回应的根本难题。

当然，从现在开始，文革有了其他目标。由于意识形态存在于一定社会的全部实践中，所以文革就同时涉及到了出现在经济实践、政治实践、科学和技术实践、审美实践、教育实践等等中的其他意识形态形式。

在所有这些领域，文革都提出了一些根据其长远目的而确定的近期目标。归根到底，它们都与解决这样一个根本难题结合在一起：即两条道路的难题。

c) 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和方法

文革的手段和方法，建立在这样一条原则之上，即文革必须是一场群众的革命，这场革命要改造群众的意识形态，而且要通过群众自身来改造。

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改造意识形态，或改进某些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认识，甚至不在于专门改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算这种改变确有必要）。问题在于改造全国群众（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在内的数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俗。

然而，这样一种群众的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只能由群众自己在群众组织中并通过这种组织来完成。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在于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坚定地相信群众，并要求所有政治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大胆追随这条“群众路线”。必须让群众发出声音，必须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会有一些错误产生（它们在一切运动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错误将在运动中得到纠正，群众会在行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但绝不能以“可能”会犯错误或过火为借口，预先约束和阻碍这一运动，这样会破坏运动。同样必须预见到，这一群众运动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有时还是很严重的阻力，这些都是正常的，毕竟文革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些阻力可能来自旧统治阶级的代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来自被误导

的群众，甚至可能来自党的某些领导人。必须有区别地对待这些阻力，辨明敌友，并在反对派中间区分出敌对的无可救药分子、墨守成规或不明就理的领导人、犹豫不决的人和胆小怯懦的人。无论如何，即使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敌对分子（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时，也应当一直坚持劝导和说服，而不应进行“打击”、诉诸暴力。

群众只能在群众组织中行动。文革最富原创性的手段，文革的创新，在于出现了专属于文革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其他的阶级斗争组织（比如工会和党）不同。这种专属于文革的组织就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组织。

这些组织最初似乎来自基层的首创（小团体、学习小组、人民委员会的创立）。就像列宁在苏联所做的一样，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为它们提供支持，将他们的榜样在文革中全面推广，即公开号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专属于文革的组织。

在把这些新组织与旧组织、新目标与旧目标联系到一起时，中国共产党是十分谨慎的。

因此，我们总会发现：文革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并且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农村，文革的目标总是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确定的那些目标结合在一起；大学生组织既不应该出现在工厂中，也不应该出现在农民群体中，因为在那些地方，工人和农民要自己发动文革；文革不应当阻碍生产，相反，应该促进生产，等等。

同时，中国共产党宣称，这场运动的先锋，目前是那些青年群众组织，主要是城市青年，首先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这虽然是实际状况，

但它的政治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正在培养中国青年的教育系统(不应忘记学校总会深刻地影响人，即使是在历史剧变时期也一样)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堡垒。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未经革命斗争和战争洗礼的青年构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们是未来生死攸关的一部分。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听着长辈们受剥削的故事长大，这些都不足以保证青年人就是革命的。不管这一年龄的人多么有活力，如果由于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他们被遗弃在意识形态的混乱或“空白”中，那么，在实际上，他们就是被交给了各种“自发的”意识形态形式，而后者会不断地去填补这一“空白”。那是一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要么继承自本国的历史，要么是由外界输入进来的。这些意识形态形式很自然会在学者们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反政治的”唯技术论中找到支持。相反，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让自己的青年参与一项伟大的革命工作，如果这一工作可以在实践中教育他们，那么这些青年就不仅会在文革中改变现有的意识形态，还会通过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而自我成长，从而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无论是哪一种意识形态，都对青年起着最大的作用。问题是要弄清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来说，起作用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文革从总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文革的青年组织为青年回答了这一问题。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对文革的号召、对群众的号召、对发展文革群众组织的号召，它们的方法，包括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条件，都是由共产党制定的。这就意味着党依然是中国革命主要的核心领导组织。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党最坚决地确定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原则，它的最高原则：“毛泽东思想”。这是一种运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中的马列主义，是由这种经验所丰富了的、以一种可以直接被群众所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马列主义。

所以，文革既不是对群众盲目“自发性”的欢呼，也不是政治“冒险”。对群众的号召、对群众的信任，以及群众组织的创立，都是与群众的需要和群众将来可能的发展相一致的。但是同时，文革又是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它建立在对局势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建立在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同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革的最高原则都是马列主义。

以上就是文革的形势、目标、手段与方法。

2. 文化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

对文革的这种分析自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难题。

通过它的那些决定，文革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政治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危险；在生产关系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政权下阶级斗争的持续；一场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专属于这场革命的群众组织的必要性，等等。

这些全新的政治论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吗？

a) 核心论点，即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可能性的论点，提出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难题。这个论点无疑会与一些信条——

——那些信条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宗教的、进化主义的、经济主义的解释)——相抵触。

事实上,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宗教本质的历史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保证,把它当成是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向其迈进的目的地(but),那么这个论点就是无法想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也不是历史的“终点”(fin)。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进化主义,这个论点同样是无法想象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解释中,存在着一种关于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得到保证的前后次序:例如,谁都不能“跳过”某种生产方式。在这种解释中,人们保证了自己始终只会向前发展,从而在原则上排除了一切“倒退”的危险:只能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而不会退回资本主义。

而一旦进化主义迫不得已承认“倒退”,它也会认为倒退就是退回旧形式本身,毫无变化地回到过去本身。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进化主义,它的历史辩证法观念承认滞后(décalages)、曲折、非重复的倒退、跳越等等。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某些国家能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向某种在原则上已经被跨越的生产方式倒退(如南斯拉夫)。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倒退并不是完全简单地向后回到原原本本的过去,回到旧的形式,相反,倒退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而实现,那就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中插入一些新的形式（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外表”下产生一种新颖的（originale）资本主义形式。

最后，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主义，“倒退”这个论点也是不可能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释那里，只要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基本废除，就可以断言社会阶级已经消亡，同时消亡的还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从而还有党和国家的阶级属性。总之，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得到了“最终保证”。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经济主义。

b) 事实上，一个社会阶级不仅仅由其成员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position*）来界定，因而不完全由生产关系来界定，它同时还由其成员在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中的立场（*position*）来界定，而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仍将长期是阶级关系。

毫无疑问，界定一个社会阶级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生产关系），但阶级斗争构成了一个体系，它在不同的层面（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某一层面的改变并不能取消其它层面的阶级斗争。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消灭了有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仍会在政治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上残酷地持续下去。

因此，各社会阶级在本质上是根据政治的阶级斗争形式、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形式来界定的：根据它们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对各社会阶级具有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持续存在某些经济关系（至少有让列宁忧心忡忡的小商品生产），它们构成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同样，收入上的显著差异也能充当阶级区分的经济条件，这些区分对某种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来说是必需的，但这种阶级斗争却基本上在经济领域之外，即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演。

c) 要点在于：“倒退”的论点假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历史形势下，意识形态能成为决定一切的战略要点。因而，岔路口就在意识形态领域。未来就取决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前进或者倒退）就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上演。

这个关于在工人运动史的某种政治形势中意识形态可能起支配作用的论点，只会触犯那些经济主义、进化主义和机械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只会触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无所知的人。只有那些混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了矛盾的主次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变化的人，简而言之，只有那些混淆了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在特定生产方式中或特定政治形势下某种特定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的支配作用的人，才会对这个论点感到惊讶。

因此，文革的决定和实施相当于宣告了两个论点：

——1. 在社会主义国家，“倒退”的过程会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其影响正是通过意识形态传递，并逐步触及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

——2. 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革命，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阶级斗争，我们可以阻止或扭转这个过程，并引领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另一条道路：“革命的道路”。

从形式上来说，第一个论点意味着：一旦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旧的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就可以认为它已经消灭了阶级因而消灭了阶级斗争。就可以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被超越了，即便它在政治领域，并且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仍在继续上演。看不到阶级斗争尤其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就是将意识形态领域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将阵地让给敌人。如果敌人已经出现在战场上，却没有被认出来，没有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反而任由它主导游戏，那么当它赢得阵地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接下来，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机制、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就可能会被建立起来。接下来，就会是政治的中立化，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利用、在经济上统治。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具有的是社会主义下层建筑，另一方面具有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即如果它建立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上的话，就无法想象它能够持久地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文革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一些结论：为了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下层建筑赋予一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革命。

这个论点并不新鲜，马克思和列宁就经常提及。马克思说过，每一个下层建筑都应该有一个与它“相适合”的上层建筑，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该改变其基础和形式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还有意识形态。列宁也曾公开说过文化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新鲜的是，这个理论论点今天出现在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的议事日程中。在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感觉到有将这个论点付诸行动的必要性，又同时具备这样做的能力。

说这个论点从根本上来说是经典的，这还不够。把它付诸行动的实践才是某种新鲜的东西，这一实践反过来又照亮了这个理论论点以及支撑它的那些原理。不学习一些关于意识形态和群众的新东西，就不可能进行一场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在这里我们开始发现，文革不仅仅是根据现有的理论原理提出一些理论难题，它还迫使我们去关注由它的实践所生产出来的或必然会生产出来的一些新的理论知识。

d)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性质的原理付诸了实践。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什么是意识形态领域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包括三个特定的层面、机关或领域：

这些“层面”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连结在一起。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

如果用建筑学的比喻（即房子的比喻：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代表了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用这个比喻，是为了既指出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上层建筑而非下层建筑）和它对于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指出它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依赖关系。

相反，如果我们要给出意识形态的具体存在形式，更好的办法是把它比作“水泥”，而不是比作大楼的某一层。事实上，意识形态渗透到了大厦每一个房间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了每个个人与他们的全部实践、与他们的所有对象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与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关系中，渗透到了各种“个人的”关系中，等等。意识形态就是那种在社会中起区分和粘合作用的东西，无论所涉及到的技术区分还是阶级区分。意识形态是对整个社会的存在来说不可或缺的一种客观现实。

尽管意识形态调节着个人的“生活”与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对象、他们的阶级、他们的斗争、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世界等等之间的关系，但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是个人的或主观的。

正如社会的所有“层面”一样，意识形态由一些客观的社会关系构成。正如存在着生产的（经济的）社会关系一样，也存在着政治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最后一个词组来自列宁（出自《什么是“人民之友”》）。必须严格按字面意思对待这个词组。要

认识意识形态，就必须认识那些社会关系，以及构成这些社会关系的东西。

这些社会关系由什么构成呢？它们不仅由“观念－表述”体系构成，还由“态度－行为”体系构成；因此，它们由“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构成。因此，意识形态不仅包括观念体系（即严格意义上的诸意识形态），也包括“态度－行为”的实践体系（即各种习俗）。

观念和习俗是辩证联系的。根据阶级处境，根据形势，根据它们所在的领域，观念与习俗之间可能具有总体的或部分的同一性，也可能有错位或矛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辨认出部分体现了对方意识形态的那些观念和习俗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知道如何在不同的观念之间，或在各种观念和习俗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伟大的革命总是懂得在观念和习俗中做出这些区分，并在抛弃过去的“坏”东西的同时，保留“好”东西。无论如何，意识形态革命必然不仅仅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它还是实践的态度、行为（或风俗）上的革命。

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性质让我们懂得，一些意识形态倾向能够像被铭刻在观念中一样，被铭刻在某些行为和某些实践的态度中。它让我们懂得，某些“习性”或“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某种领导“作风”，会具有意识形态的含意，并且可能会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背离，哪怕这种作风和习惯是发生在社会主义领导人身上。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在某些实践中，即在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某些政治的、技术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等等习俗中，找到支持。这和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人的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中找到支持完全一样。如果这些“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大行其道，它们就不再仅仅只是私人的“怪癖”或瑕疵：它们会成为，或将会变成社会区分的象征，使人（无意识地或有意地）站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另一边。例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领域的领导人，他们的官僚主义或专家治国论的行为，都会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提供同样的支持。

文革之所以严肃对待这种威胁，是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相一致。但与此同时，为了严肃地对待它，文革不得不深入研究这个理论，从而不得不促使它向前发展。

e) 最后，文革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其组织形式的原理付诸了实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论点意味着：存在着专属于文革的群众组织，因而这些组织是与党的组织有区别的。对于许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些有别于党的新组织的存在构成了明显的难题。

阶级斗争的组织问题，以及各组织之间的区别的问题，是工人运动史上的老问题。就经济的阶级斗争组织（工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组织（党）之间的区别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功能上的区别是与组织形式上的区别并驾齐驱的。工会是群众组织（并不需要民主集中制）。党是先锋队组织（需要民主集中制）。

因此，到目前为止，党同时负责了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但文革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创新，创造了全新的第三种组织：专属于群众

意识形态斗争的组织。无疑，这种组织也要执行党的决定，但它又与党有所区别。此外，它把自己和党区别开来，是因为它和工会一样，是一种群众组织（民主集中制在这里不通行：据说文革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像“巴黎公社的代表”那样选举出来）。

这种惊人的创新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呢？

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说，组织间的区别反映了社会现实各机关或各层面的区别。在经济层面，有一种群众组织（即工会）；在政治层面，有一种先锋队组织（即党）；在意识形态层面，也有一种群众组织（即那些文革组织）。

但或许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种此前并不存在，而且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明确预见到过的第三种组织，从此会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必不可少的组织？

我们可以谨慎地（但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在以下事实中找到，即对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党和工会的位置变了。

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必须负责管理国家、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机器。因此，党和国家机器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部分的融合。

由此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难题，这也是列宁晚年在一些文章中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提出来的难题（参见《关于清党》、《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等）：如何调节党和国家的关系，以避免犯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的错误，避免它们的严重政治后果？

列宁试图通过一个机构（即工农检察院）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个机构是党的衍生物。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更不要说是群众组织了。

四十年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文革，回应了列宁以悲剧性的方式所提出的这个难题（列宁认识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超出了当时苏联所具有的历史能力）。

文革的回应：不是建立一个控制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机构，而是发动群众运动和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当前，这些组织在文革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揭露和批判那些脱离群众的领导——他们因为自己的观念和“习俗”，因为生活、工作和领导习惯，沾染了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的风气，放弃了“革命的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文革就这样为列宁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办法。在党半被动半主动地和国家相融合的时期，要迫使党把自己与国家区别开来，负责第三种革命的第三种组织就必须与党（无论是其存在，还是其组织形式）区别开来。

如果这些分析在原则上是对的——虽然它们还只是概括性的，那么很显然，文革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所有共产主义者。

文革在政治和理论上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关于革命的观念的庄严提醒。政权的夺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帝国主义威胁笼罩下的世界，阶级斗争依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因此，首先是意识形

态中的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前进还是倒退，革命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文革的伟大经验超越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历史宗教，也不是一种进化主义或者经济主义。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之一，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成为战略要地，阶级之间斗争的命运就在这里上演。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间存在极其深刻的联系。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任何伟大的革命都只能是群众的事业。而革命领袖的作用，就是在给群众提供指导自己和组织自己的手段的同时、在给群众提供马列主义作为指南和原则的同时，走进群众的学校，帮助他们去表达自己的意志，解决他们的难题。

问题不在于输出文革。文革属于中国革命。但它的理论和政治经验却属于所有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应该向文革借鉴这些经验，并从中获益。

张春桥

接见上海工总司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时间： 1966 年 11 月 21 日，地点：上海红都剧场。〕

在长时期热烈鼓掌、口号声中工人造反队代表给张春桥戴袖章。

张春桥讲话：

同志们：（台下叫：曹荻秋靠边），我首先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慰问。（鼓掌）向全体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高呼口号）

中央从知道同志们乘车北上，那就非常关心这个事情，立刻决定派我到上海来和同志们见面，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我到上海以后，算一下时间，我是十一号离开北京的，到现在十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在这十天中间，同志们：你们走得最远到了南京，到了六河，那么这样我就非常不安，北京给我打电话，也是问，说南京的同志回来没有，这中间，中央文革小组还曾经直接打电话到南京，请江苏省委转告你们，说我已经到了上海，这个你们大家已经知道了，中央对这件事情极关心的。

对同志们的行动，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虽不知道前因后果，很仓促，因为只知道交通受影响，而那个时候，全国的交通，同志们都知道，现在是很紧张的，因为有大批的革命师生要求到中央去

见主席，现在北京据我昨天听说，已经住满了，现在连中南海也要准备让出来让革命师生住了，因为实在是到处都住满了人，估计就是截止到廿日为止，大家不再上北京串联，在这几天里，北京可能有三百万人在里面，交通的压力非常之大，这三百万人到了北京，再把三百万人疏散出来那要占很多的火车，而工人同志们特别容易理解，我们上海的各种工业器材，煤呀，铁呀，都是要从外地运进来的，交通如果受到影响，那我们的生产，原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那样地情况就会影响很大了，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心情，伯达同志写了这样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比较仓促，考虑得不是很周到，我到了安亭以后，到了上海以后，和工人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听取了你们各式各样的意见以后，就感到了这电报是有缺点的，预先我们的情况调查得不完全，不知道甚至于这基本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这样写一个电报，仓促了。

伯达同志表示非常不安，他要我向同志们表示他的不安，同时他说，我们总要想办法来弥补这一缺点，所以这个问题，刚刚有的同志说了，说：“有的人利用这个电报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挨几炮这也没什么，我们挨得炮很多，那各式各样炮都有，我们也没什么，因为你要革命，还能不挨几炮吗？当然罗这里边有的（鼓掌）现在伯达同志的电报，一方面有人想利用这个电报来攻击陈伯达同志，这个刚才你们的代表和学生代表好几位同志都谈到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这样的意见，就是要维护伯达同志，这个不是因为我的上级，我要保他的皇，而是因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之一，我们

应该为了保卫中央，保卫正确路线，就不应该在他脸上擦黑。但另一方面，有人利用这个电报，来压群众，那是不允许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话应当说到二方面，第一方面，同志们，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很欢迎，包括我在上海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你们随时都可以批评，很欢迎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欢迎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评，另外一方面，有那么一些人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那就不叫批评了，那一种（原稿不清），可是我们决不允许用伯达同志的信，（原稿不清）错误的，因为陈伯达同志没有这个意思要压你们。（鼓掌，高呼：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气死老保！）

同志们，那么你们到北京去，是一个革命行动，你们这一次回来，也是为了革命。从这样一来一回，同志们虽然受了辛苦，有很多同志病了，有的同志没有吃好饭，挨了冻，饥寒交迫。可是这样十天里边，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鼓掌）我们就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我们上海工厂里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同志们都向我讲，你们要到北京去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你们的目的是要控告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派我来，要我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忠实地把你们的意见向党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汇报，（鼓掌、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正象很多同志都知道的：上海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我们上海的革命搞得好，对全国都有伟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上海的生产搞得好，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伟大的贡献，也有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如果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话，那么对全国也会起很不好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产搞不好，那么对全国也同样会起不好的影响。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的责任在全国工人阶级中间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确实挑着两付担子，不是一个轻担子，而是两付重担子。但是，过去中央从来是相信上海工人阶级能够挑这两个担子的，现在、将来都会相信同志们能够把这两付担子挑起来！（热烈，长时期鼓掌）

当然，不是没有困难，阻力是很大的，因为要革命，有阻力，要搞好生产，有困难，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样，我原来，拿我个人来说，我也知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会有困难的，而且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我的精神准备很不够，我没有想到困难是这样大，阻力是这样大，原来没想到，那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几乎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经过战斗，如果不经过艰苦的斗争，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那末现在，我们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就全国来说也好，就上海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这个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他们，就是苏联，搞了这么几十年，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了，但是五十周年，列宁时代没有完成革命，列宁活的时间比较早地就去逝了。那

么后来，斯大林同志领导，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将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资产阶级思想，就刚才在语录里所讲的，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末当资产阶级占了优势，占了上风以后，修正主义就要复辟了，资本主义就要上台了，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苏联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果实要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我们一定要使得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搞得彻底，搞得越彻底越好。

但是这一个革命会是相当长的时间，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舆论准备阶段。从六月一日 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从六月一日算起的话，所以这个，这样下去要多久呢？那时间很长，一直要到资本主义思想在我们社会里完全肃清，把私有制肃清以外，还要把人头脑里的私有观念，用公字，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斗争是会很长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敌我矛盾，还有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斗争，要解决起来就会有一个波浪、一个浪潮的进行起来非常的久，恐怕不是一个

战役，二个战役能解决的，而且中间会有大的战役，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所以我们工人同志，要准备打比较长的仗，要这样重新组织我们的队伍，重新教育人，把我们，从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机关，按照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检查，重新检验，看哪一些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哪一些不是，哪一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还要看哪一些愿意改，还有些不改，有的人犯了错误他愿意改，我们就欢迎。如果他改得彻底，我们就更欢迎。他有一部分改，我们就欢迎他这一部分，那么当然，如果要是是一直不改，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这是毛主席最近也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因为闹革命，总会犯错误的，我到上海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里边，我也会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有些话也可能说错了，有些事情也可能做错了，那我有一条，我反正，只要你们提出来，我的思想通了我就改，如果不改呢，那我也可能要变的，那就要变坏了，这只要是改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对干部。

对群众中间的问题么，我也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刚才喊的口号里边，有一个口号我也跟着喊了，我也举了手了，就是 " 打倒保皇派 " 这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我应该对同志们说，中央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什么呢？现在被称为保皇派的，不是那个当权的人，而是二派工人之间。

我最近，我也应该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工作，我一方面从安亭回来了，回来以后做了些安排，和总部同志谈了话，交换了意见，随后订了五条，后来到苏州，又订了五条。然后呢，那就一方面通过北京给你们打电话，希望你们快点回来，一方面在这里继续做工作，也和一些和你们工人同志经常往来的同学谈了话，听他们的意见，也听工人的意见，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从早晨九点谈起，一直到下午五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同志说是被我说服了，说可以同意我的观点。但同意也有各种各样的同意方法，同意也不完全是一个样子。还有一部分同志表示继续表示怀疑，同意一部分，但还有作问题怀疑。还有一部分同志，一直到散会的时候，还有说，我坚决反对。我也注意了这些同志，这些同志都是一些好同志并不是坏人。所以，同志们，我把这些情况跟你们介绍

一下，就是我还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也有责任向他们做工作，正如我有责任向你们做工作一样，我也希望同志们，你们能在这一方面支持我，就是你们回到厂里边，对于工人同志要采取毛主席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工人之间的问题，只能按这个方针解决，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不能用别的方法，这样，一方面他们不应该给你们扣帽子，说你们是什么、什么，那是错误的。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他们也不给人家扣帽子，现在北京，我们已经经过几个月工作，"保皇派"这个名称基本上不用了，街上的标语，没什么"保皇派"了，会场里唤口号也没有这个口号了，只是偶尔有时个别谈话，说惯了顺口说一句么，这个东西我看也不能过多地责备，因为这口号主要是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少数派，少数派，革命运动最初总是少数，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少数派，满足于少数派就不好了，我们如果光是一直是少数派，少数派光荣，那又怎么革命啊！

革命是要靠广大群众，毛主席的伟大地方就是他不只团结了一批最革命的人，而且是他团结了那些愿意革命的，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如果毛主席不采取这个方针，那我们党就不会是今天，就不可能把全党团结起来。同志们，要知道，在我们党中央里边，过去有很多人是反对过毛主席的，但是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毛主席都是和他们团结。比如很有名的人物——王明么，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么，那个反对毛主席还不是反对最厉害罗，但是不但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他做中央委员，但是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还

是选他做中央委员，我们八大的代表都思想不通，说："这个家伙还选他！"毛主席亲自出来在会上讲话，说同志们应该选他，选他有什么好处，这样可以团结多数，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已经写在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里边，你们还记得吗？五个条件里的一条是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反对你，而且证明他是错误的人，不晓得你们注意了没有。如果反对你，他是正确的，他反对你，当然应该团结罗，问题有呢，他反对你，而后来证明他是错误的，还要跟他团结这是同志们，主席是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这个话一点不假，我身边没带，你们自己去查，上有没有这个话？（工人：有！鼓掌）

我的意思是说，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你们这个队伍如果想过，搞一浩浩荡荡革命队伍的话，就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你们如果不学习这个，或者口头上学习了，不执行，那你们就一直叫做少数派，而光是有一个少数，革命是搞不成，一定要使自己从少数逐渐变成多数，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才能够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熟了，而且你们给我戴了袖章，我想，我说话就坦率一点，我这个话你们鼓掌，我就很高兴。现在我戴袖章，我应该申明一句，因为有的同志跟我提，说作你们的政治委员，我觉得我应该申明，你们给我戴袖章，我很光荣，但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有

一个约定，就是不担任群众组织的职务，因为如果答应，那么所有的组织都会要我们答应担任职务，我们也不能说：“我只支持一派”，因为我们要对各派都做工作，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工人阶级，把我们劳动人民的队伍，彻底地按照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组织，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间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坚强的、战无不胜的坚强的部队。（鼓掌）

因为同志们很辛苦，我想我今天不准备多讲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我想同志们这二天是不是可以，有的身体好，当然就可以回厂工作了，如果有的有病，还需要治疗一下，有的同志还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回来了，我现在心里就安下了，我就可以和你们总部，你们大队部，我们一块好好地商量一下，把工作安排一下，这儿还有些条子，都是给我们提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那里研究，在起草文件，准备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讲了。因为到底怎么定，这问题要中央才能决定，我在这里，而且今天不是这样一个讨论工作的会，我是欢迎同志们我们大家来见面的，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都要专门开些座谈会，听同志们意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是让我在这里多听一些工人同志对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一定负责汇报中央然后中央加以规定。这样，我们中央再有一个补充意见十六条，因为十六条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那些原则都适用于工厂，但是工厂毕竟有工厂具体的问题，完全用在里面，有些具体问题它没有，所以中央同志准备写一个文件，等你们回来，我和总部的同志就可以安排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安

排一些座谈会，这些问题，我想今天就不答复了，而且因为这几天，几乎到了上海以后，就是不断的谈话，谈话，谈话，你们听，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一直很痛，所以我想今天就不讲了，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祝同志们身体好！（长时期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志们，再见！

（以上是录音记录）

姚文元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议，边战斗，边整风，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促进我们思想上、组织上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今天我们开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再促进一下，使我们的已经开展的整风运动做得更好。今天我谈这些意见，完全是一个同志和战友的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谈。

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为什么要整风？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议草案里规定的四项任务，正在逐步地胜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从上到下，在需要夺权的地方，都正在胜利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各条战线上的

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彪同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在前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跟着前进，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只有把这些矛盾解决了，我们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两个方面都去夺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不断去掉我们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错误的东西。我们这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只有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艰巨、复杂、光荣的任务。

同志们想一想：赤卫队会不会整风？红卫军头头会不会整风？还有那什么“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会不会整风？还有什么“联动”，“国际打狗队”等等反革命组织会不会搞整风？不会，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一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出来。想把革命停止下来、开倒车

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说有人说：我们起来造反，白天黑夜的干，又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还要开门整风呢？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为自己，所以搞整风。这决不是什么“包袱”，相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前进的动力。

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备的理论，这一套完备的理论，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象刚刚大家学了好多语录所说明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有大量精辟、深刻的指示，这些语录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风过程中再三地学。

毛主席提倡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又为革命服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肃清这本书的流毒。这本书讲的什么“修养”，就不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讲来讲去，离不开“个人利益”，教人怎样往上爬，怎样捞名誉地位，做伪君子，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是不讲革命。刘少奇这本书讲的“修养”，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为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讲共产党员应当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革命，而大讲特讲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呢？这本书说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反动影响，我们以后还要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用毛主席的关于整风、关于建党的思想来肃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同刘少奇这套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完全针锋相对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著名文章《整顿党的作风》，首先就是讲革命。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鲜明：为了打倒敌人，兵要精，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碍革命、阻碍我们打倒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大家前几天看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这是在整风当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范例。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提出了当前革命组织中阻碍革命前进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想，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透彻的批评。是为了革命而整风，不是离开革命需要去整风。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当这样办。

可不可以这样说：“开门整风”包括了两重意思？一是我们革命组织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批评，革命组织负责人虚心倾听广大战士的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相互交心，敞开思想，不是彼此“关门”“保密”；

二是我们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紧紧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不是光为把我这个小团体整好，而是为了要把革命搞好，为了解决那些广大革命群众都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把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是为革命而整风，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为整风而整风。现在有一些单位，整风中间没有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开门整风，应该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风来推动工作，推动革命，打败敌人。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思想，以及为了贯彻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而规定的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等等）。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各种表现。上次春桥同志讲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的深刻的批判。通过整风，使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反动东西究竟是什么，能识别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到底。

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克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各种错误思想。使我们真正能夺好权，用好权。今天报纸上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江南造船厂船坞吊运车间的造反派，他们就是通过开门整风，促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这是一个好经验。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工作以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进。

简单地说，这次整风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再简单，一句话，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来干革命。

总之，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这次整风，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是否定一切。这次整风，一定要整得我们大家充满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勇敢前进，而不是把人整得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各单位要根据这个精神，分别不同情况，确定自己整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都热烈的欢迎整风，正在整风的不少单位已经在开门整风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有少数同志，特别是有些负责人，对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还有很多顾虑，还有这样那样的“怕”。这一些“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去掉。怕点什么呢？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我们一整风，保守派就进攻了，右派势力反扑了，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毛主席教导出发：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怕也没有用，只能因势

利导，夺取胜利。不管整风也好，不整风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还不死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坏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总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开门整风是对革命群众“开门”，绝不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开门”。但是，如果坏人借整风机会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门而出”，要跳出来，攻击革命群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让他来较量一下吧！准备着再来一场大论战吧！暴露了是好事，与其暗地里活动，不如公开说出来。已经有人跳出来较量了，只落得一个惨败。还有的同志说，有的赤卫队头头要跑出来了，不死心，要搞反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反扑，最好公开站出来反扑，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来，再针锋相对地大斗一场，大辩论一番。老实说：革命群众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经过一次反复，增加一次锻炼，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所以，我们要有反复的精神准备，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要轻易将提意见的群众都说成是“保皇势力反扑”。有的人，开始“保”过，后来觉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风提意见，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我们就要听。不要一动就扣上“捞稻草”的帽子。有一个厂的造反大队开门整风，群众刚提了一点意见，马上贴出大幅标语：“谁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来，座谈会成了哑巴会，结果这个组织又贴出第二条标语：“谁不向革命造反派提意见，谁就是反对革命派！”结果，群众更不讲话了。还有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开门整风，大家都有

些缺点，都怕对方揪自己的小辫子，怎么办呢？彼此都在对方办公室门上贴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样整风怎么整得好呢？当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提出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计形势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我们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就不会怕了。

（ 2 ） “ 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有的人怕通过整风，实现了按部门的大联合，自己回到车间、班级，变成少数，别人整自己没地方说话。有这样思想顾虑的同志还不少，阻碍了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靠山。第二，现在上海市已经夺了权，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把党、政、财、文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是用来支持全市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是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么会没有依靠？第三，离开原来的革命组织回到部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扩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强革命组织，不是取消革命组织。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整顿组织就是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了，都解散了，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提到的整顿组织，是把革命组织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归

口，加以整顿、提高，还是要的嘛！红卫兵还是要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还是要的嘛！不过这是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加以整顿、提高之后，大大加强革命派的战斗力，怎么会“没有依靠”呢？这种误解是不对的。怕当少数派，这个怕字去掉它。

当然，现在因为全市运动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门之后，保守势力比较厉害，甚至还有坏蛋在掌权。在某个部门里，革命力量暂时还联合不起来，或者联合起来了暂时还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这种情况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开始不就是少数吗？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时候，不就是少数吗？我们是通过斗争，团结群众，使自己从少数变成多数。我们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呢？因为我们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因为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学生、干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同志们，我们都要争取做毛主席所谈的这样的好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什么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还是少数，正说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些空白点，还有些弱点，需要我们革命力量到那里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坚决去，开辟新局面。学校里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中学，还有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工厂，有这样的情况。那里革命力量按班级、车间来看还是弱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开

辟新局面，使自己少数变为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就不怕当少数的，这是我们造反派的精神，这个“怕”字应该去掉。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为阶级夺权，是为劳动人民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这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是针锋相对，不能退让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权，一定要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夺回去。但是，我们决不是为个人争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手里的权是哪里来的？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是革命给我们的。大家回想一下这半年多来的战斗经历，我们因为要革命，所以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士选我们当领导，给予信任。所以，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继续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

有的同志开始造反的时候没有包袱，什么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现在怎么怕整风呢？就因为胜利了，有了权，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志们，无产阶级是没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无产阶级才能得到

彻底解放。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就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的无产阶级的权，劳动人民的权还多得很，将来应该全世界的权都归无产阶级，都归劳动人民，都归革命派来掌握。国际歌中不是这样唱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一点权力就满足了，就前怕狼后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权，就不敢再革命了，就不能再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更大的解放而奋斗了。如果不丢掉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为革命造反派服务了，不为劳动人民服务了，走向了反面，即使你个人手里的权没有丢，无产阶级的权却丢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去掌握了。所以，这种怕，虽然是少数同志，我们也希望坚决的去掉。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有的革命组织因为运动开始以来，从来没有整过风，本来内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之间相互意见很多，平常没有放到桌面上来，怕一整风，闹翻了，各干各的，不好收场。

我们的整风，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认识。整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但是，怎么才能有统一意志呢？大家不讲话，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搞自由主义，能够有统一意志吗？没有的！要有统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这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总是有矛盾，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欺骗自己。一种矛盾解决

了，另一种矛盾又会产生，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的同志就会进步，革命就会前进，革命组织就会巩固；如果回避矛盾，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大家意见分歧，心里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怎么能够有统一的意志呢？只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去掉，纠正。才能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可能有统一行动，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最后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在已经建立大联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过讨论，整风，巩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让矛盾积累在那里，那一旦爆发，反而不可收拾。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这种顾虑，现在要整风，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么办呢？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别人提意见的同志，要认识整风的积极意义，不要把整风当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风的机会算总账，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另一方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要挺得住。所以，这种顾虑也可以打消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革命同志，大多数的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的，还是毛主席讲的，相信大多数这样一个根本观点。

这些“怕”字，都因为“私”字作怪。我们一个人，一个革命战士，要无私才能无畏，一个人无私无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没有私，

就不怕，你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你就得到了自由。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们在造反的时候经常用，现在我们还要用这句话。我们向敌人开火的时候，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拚死斗争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在整风的时候，也要用这句话。毛主席这里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就无所畏惧的去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风中敢字当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改正错误，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这样那样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不过对于整风的目的意义还认识得不太清楚，思想上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怕。当然，也有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怕整风。毛主席说过，怕整风的人，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有某些错误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当头不怕整风，混进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就躲不下去了，就会被揭发出来了。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说，但需要提醒。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

有人问：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确，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矛头应当对着谁？这个问题整风中首先要弄清楚，这也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基础。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对准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等，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这是十六条及党的各项文件都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们从运动以来的一条基本路线。不管在学校，在工厂，在夺权以前或以后，都是这样。夺权以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以后，还要继续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到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对于刘少奇等人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批判，有些就在报纸上批判，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艺上（文艺上就是陆定一、周扬那一套）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工作搞好。应当看到：这个批判任务，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一类是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

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我们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破坏这个大联合；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而不是为了削弱对敌斗争；是为了彻底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打倒敌人，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放着那些阶级敌人不管。忘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敌人，那就完全搞错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于全部精力用在革命组织之间“打内战”，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把别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大方向搞错了。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矛盾，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放着牛鬼蛇神不斗。有的地方甚至让牛鬼蛇神在那里养得胖胖的，但是把运动初期犯过一些错误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这样做是危险的。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跳出来说，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么“自己解放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的地方，坏人也跑出来反攻倒算。发生这类情况的地方，革命组织首先要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来。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大联合”的号召唱对台戏。这个口号不但上海有，在别的地

方也有。它同样是抛弃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就会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道路上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感到高兴。我们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路线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违反这一条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说现在大方向问题在一部分单位是存在的。

当然，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如果坚持错误，就会发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同敌人站到一起去，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进行整风，也是为了帮助这少数同志掌握斗争的方向，能够再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从北京到全国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是会有反复的。北京的红卫兵最近举行了几次反逆流的大会，打退了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他们红卫兵报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面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同志们，从电视里不是看到陈丕显那副顽抗的样子吗？那么他还在幻想什么？他还在梦想什么？他无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来一个反革命复辟。陈丕显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代表人物。全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

已经经过了多次反复，再增加一次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北京的这一股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里的革命人民坚决粉碎了吗？我们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夺了权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红卫兵战士，也应该针对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头痛击！正象我们历次表示过决心一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永远支持全国革命造反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谁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垮台！

我们应当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充分看到运动的主流，正确认识运动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险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当前运动的主流和大好形势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斗争还很尖锐，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整风，坚持群众路线，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掌握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上海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新反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我们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当中，首先能够明确大方向。假使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各个单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大踏步地前进。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这是最近中央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毛主席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夺权斗争的需要。只有我们深刻地树立起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认识什么叫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是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是错误的。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也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已经有些很好的经验，就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通过斗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通过共同对敌斗争，团结

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开门整风，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学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的方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有的同志，忘掉了还有敌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势力还千方百计的想复辟，忘掉了我们还有革命的严重的任务，还要反复辟，还要搞斗、批、改，忘掉了这一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了，心里想的范围很小，只有我这个团体怎样、怎样。林彪同志曾经说：要去掉局限性。个人主义是一种局限性，小团体主义也是一种局限性，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去掉这种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目标远大，要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能看到斗争的全局，去掉局限性。

任何一个正确的口号，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联合刚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说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组织”，“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都取消，和群众合并”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整顿，不是不要革命组织，经过整顿以后，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革命的红卫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战斗性。很明显，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了大联合不是造反派还存在吗？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联合，就

挑动“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后什么组织都没有了”。我们要识破。革命的大联合，决不是取消主义，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并起来。

在中央指出的种种错误倾向当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在一月革命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文汇报有一篇“风头主义”社论，写得不错，据说也有人讲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倾向也讲了不少。目前成为大联合比较普遍的思想障碍的，是小团体主义。所以今天着重要讲一讲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要破小团体主义，就一定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树立这个思想，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种革命造反的组织？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我不是指那些经济主义的组织，不是那种“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是因为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要起来斗争，要起来反抗，要起来夺权。那个时候，在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掌握着党、政、财、文的大权，使我们不可能从上到下组织自己统一的阶级队伍，怎么可能呢？权在他们手里！那个时候我们革命造反派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学校、工厂、机关，有一些组织形式完全是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确立起来的。只能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立，要统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卫队之类的御用组织，那是一个

晚上就有五十万袖章发出来了。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只靠我们一个团体的胜利，是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你一个厂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能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吗？工人阶级就能永远不受压迫了吗？不，决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导我们。在中国，不但靠一个小团体不行，光靠你一个厂、一个校、一个区、一个市也不行，只有我们全国都彻底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紧紧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里，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个方面确立毛主席的路线，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胜利，一直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彻底消灭。这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现在，我们全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需要按单位、按部门、按产业这样子来归口。所以，所谓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就是一个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一个珍贵

的权利，是我们用艰苦奋斗，甚至用流血斗争争得来的权利。过去的革命造反派，怎么可能这样归口组织自己的强大的阶级队伍呢？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认真地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个小团体，可以保护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这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罢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是还可以产生第二个修正主义者吗？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不是“罢官革命”，也不是小团体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一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我们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刚开始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可能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想作一个保守派，我们要再革命下去，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

小团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讨论，举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 1 ）在夺权的时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只想用一个团体掌权，只想“我”这个团体掌权，来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想怎么发展“我”这个团体的势力，尽量扩大“我”这个团体手里面的权力，而不是想到怎样去搞革命的大联合，

共同对敌。这样做的结果，革命的大联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销了。你说没有权吗？也夺了，你说夺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权，用好权，对于无产阶级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内战了，忘记了还有一个外战，使夺权、使搞好革命都受到严重的妨碍。甚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几个造反派内部斗得很厉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哈哈笑。不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有几派，每一个派在一个厂里有几条线。结果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闹矛盾，几个组织上面都有头头要抓革命，促生产也搞不好。据说有这样一个局：两个造反派有半个月的时间尽打“内战”，就是相互贴大字报，相互辩论，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抓工作，什么都不搞了。据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个团体，搞了三部电影纪录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起来搞一个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一定要搞小团体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组织组去登记的有六百六十二个组织，其中全市性的组织二百二十六个，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组织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联合，这么多组织，都往基层里布置工作，基层里吃得消吗？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呀？

现在革命的大联合势不可挡，已经有好多很好的单位了。今天报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厂一个车间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了吗？上海也有一批厂嘛，象爱民糖果厂，他们厂里就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控江中学的红卫兵，经过了军政训练，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复

旦大学的红卫兵，也通过了学习整风，通过斗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据说，南市区公安局，几个革命造反组织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也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昨天报纸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表了声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联合，这个很好。据说杨浦区前一个时期，百分之八十的工厂有两个到三个造反队，每一个造反队都同上面挂钩，统一不起来，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干革命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开门整风，联合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还有财贸系统，也有两个组织，据说闹了很久，不能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次整风，真正能够解决大方向的问题，真正能够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联合起来，那样对于财贸系统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进一步吗？不就可以考虑筹备财贸系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吗？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考虑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战斗。

据说有一个厂里面有这么一个口号，他下面车间里面有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厂部的组织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认、不提倡。”这个“三不”主义是不对的。这个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待革命组织不就是不承认、不支持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不能够！

还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

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先讲清楚。

（2）大联合我赞成，甚至举手赞成，但是大联合要“以我为主”，只能是你并到我里面来。有的同志很爱惜自己这个团体的名字，大家在“杀”出来的时候，共过患难，共过战斗，对自己组织的名称有感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不都可以改吗？这个名字是我们最热爱的名字，主席讲改，就立刻照办了。

对自己组织的感情如果发展成为一定要吃掉别的组织，只能人家并过来，那就错误了。每一个革命组织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联合，或者是“以我为主”，革命早的说：“我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为主”。那么革命比较晚的呢？说你老造反犯错误比较多，我新造反犯错误比较少，要“以我为主”。人数多的讲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我为主”，人数少的说你那个人数多的是大杂烩，要“以我为主”。那样的搞法就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大联合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思想

真是说中了我们的要害，打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窍门，我们不应当只看局部而应当看全局，一个厂的全局、一个局的全局、一个系统的全局。如果在局部看来有些困难，在全局看来是可行的，是需要的，是必须的，我们就应该服从全局。我们应该从全国、全市以及本单位的全机关、全校、全厂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时候，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不需要我来多说了。

控江中学的红卫兵在讨论实现大联合以谁为主的时候，也是有过争论的，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之后，认识到“以我为主”是搞不成大联合的，结果他们经过辩论提出了三条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实现按班级的大联合：第一、组织不论大小，人数不论多少，看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第二、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三、各个革命组织坚决打倒小团体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革命不分先后，各革命组织一律平等。他们提出了这三条原则，结果把很多分歧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我觉得这三条很好，可以供同志们讨论、辩论时参考。

（3）争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劳只归于自己这一个组织，甚至于只归于自己一个人，忘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忘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群众，艰苦劳动，日夜奋战，我们讲过多次，春桥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们没有上码头，我们没有到火车站，在一月革命当中，我们的贡献最少，真正的贡献是那些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是他们有贡献，工作是他们做的。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功。要

说“摘挑子”，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摘桃子，不是个人摘桃子。还有些同志他们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只想保持自己团体的现状，不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好象更多的人一团结，我这个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不愿意随着政治任务的改变，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结果思想上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同志们，革命是要前进的，时间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过去有功劳，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派如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那这革命性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因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保守的立场上去。我们一定要做不断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联合，自上而下，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按产业的大联合，当然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岛、贵阳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在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级革命组织怎么办，我们说，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如果积极支持搞下面的大联合，成为一种促进力量，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你如果反对大家搞大联合，那人家就要起来反对你。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看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当促使我们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有一些人过去受过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坏主意欺骗、蒙蔽，现在他们要起来了，要革命，我们

要不要他们？我们应该是要他们，不是要排斥他们，我们团结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革命事业才越来越兴旺。

我们希望经过整风，去掉了小团体主义，能够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有若干厂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是不是可以考虑按产业（如冶金、纺织、化工、电机、仪表……），召开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这个职工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可以选出出席全市工代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委员会，也可以选出参加局里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产业大联合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全市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将是一个隆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会。工总司的各级领导人，希望你们能下厂去，积极促进这个大联合。比如大学，我们是这样设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学，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筹备召开上海的红代会。也可以串连，学校里面、学校之间的大串连以后还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动。我们曾经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建议过，比如说，“五一”“五四”能不能开全市的工代会、红代会。能不能在这前后也能够开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全上海的工农学的革命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这能不能实现，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大家的努力。自然也不必赶时间，我们不是为赶时间而工作的，时间来不及迟一些也可以。当然，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造反组织以后，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现在就不要忘记。还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

大联合实现之后，都要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而斗争。看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能够说，因为共产党有两条路线斗争，而且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共产党以来，中国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领导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核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这样革命就可以不断发展。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下团结更多的群众，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

上面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是希望一点，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去搞革命的大联合，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去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搞什么大联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组织，甚至于跨部门的组织。不是决议已规定了不要搞跨部门的组织吗？他们想干什么，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想利用搞革命大联合的机会，篡夺领导权。有一个厂，近半个月之内就冒出了二十二个组织。看来，在有一些地方，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可能有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鱼。我看见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署名是什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联络站”“红三司”从来没有个总联络站嘛，怎么工人里面

有个总联络站呢？是否他们自己挂上这个牌号？明明规定不要成立工人学生的混合组织，为什么打出这个番号呢？这一张传单里说什么过去搞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他们执行“党纪国法”，受到了“种种的政治迫害，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现在要“杀”出来了，你们这一种杀出来要造谁的反呢？过去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碍起来造反的时候，你们强调“党纪国法”，现在我们搞大联合的时候，你们又要强调什么要“喘过气来”，反扑过来，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是不是说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呢？相反，正是说明我们更需要加紧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我们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的实现了大联合，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总联络站”，这一种在大联合浪潮里面冒出来的值得怀疑的组织，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们革命派都联合起来了，那些别有用心、针对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会迅速垮台。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我们要继续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实行“三结合”过程中，继续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包办代替的“三结合”，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是为了要成立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这样一个机关。这样一个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一个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革命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在斗争当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自我革命的过程。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态”。现在有很多经验说明，凡是在“三结合”的过程当中继续走群众路线的，那么这一个机构成立起来就有威信，就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比较满意。假使不是走群众路线，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成立起来的机构就没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们在搞“三结合”的时候，关键的一条，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一个问题也希望各单位自己考虑一下，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

下面两种思想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都是违背革命的“三结合”的。

（ 1 ）由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没有肃清，对革命的“三结合”抱消极的态度，对于干部起来造反总是不放心，消极等待，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还有的同志认为我没有“三结合”，生产、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为什么还要搞“三结合”呢？对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实现，而是消极地等待，甚至于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这一张大字报里面，揭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这一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就讲过他在搞四清的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所谓形“左”而实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当时就批判过，站起来蚂蚁一个也看不见，蹲下去满地都是蚂蚁。毛主席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了二十三条。还有陶铸也讲过，陶铸不是说过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传单很流行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要算帐，应该算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上，不能算在革命造反派的帐上。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因为只有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把胜利的果实巩固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胁，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甚至于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夺过去。对于干部，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犯了错误，犯了路线错误，除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处，其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还

应该看到市委陈、曹他们所使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扣压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干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群众检讨，做群众的小学生，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像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信里所说的，“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应该看到经过这些日子批判、学习，大多数的干部觉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大多数的干部，就能够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打倒。最近在电视里你们不是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面起来揭露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就使得他们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吗？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更加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排斥一切干部，甚至于干部起来造反的时候还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适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抱成一团，不起来造反，不是一分为二，甚至于把矛头对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就能把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更好地抓起来（上海这地方生产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生产的妄想彻底破产。因为昨天专门开过会，今天不谈了。

我们对待干部，第一看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呢还是不严重，同时还要看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检查愿意改，包括对第一把手在里面。因为总不

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统都坏掉了。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据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于犯了错误而真正能够坚决改正的同志，要允许革命，要欢迎革命，不要不许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检查自己的错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那么过去的错误就能够成为今后做好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三·七”指示当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

各级革命委员会究竟是不是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了这一条路线，就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这一条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正是执行这一路线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去考虑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把毛主席这一条路线继续的坚决贯彻下去。

（2）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采取阶级投降主义的态度。一听说要搞“三结合”，就忘掉革命两个字，放弃革命的原则，抛弃群众路线，以实现“三结合”为幌子、为借口，把坏人拉到领导岗位上来。甚至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到领导岗位上来，搞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倾向，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众路线，而是抢干部结合，大家抢，几个派别相互抢，有的地方搞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搞“拉郎配”。凡是这

样做的地方，效果都很坏。下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机关。

据说有一个医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不搞大联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结合”。怎么办呢？就去抢干部。不管干部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结合。有的说：“管他什么干部，先把干部抢到手，以后结合的时候可以派用场，现在不抢啊，以后要结合就没有人啦。”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嘛！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态度呢？

还有的同志想“快”，就专门找一些平时不大管工作的，干劲不足的，所以犯错误不大的干部来结合，专门找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干部。甚至有的地方找运动一开始就被斗而靠边、因此后来没有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搞“三结合”。这样的“三结合”，有什么代表性？有什么革命性？有什么权威性？

这还是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地方（少数地方），坏人上台，牛鬼蛇神篡夺了领导，地、富、反、坏、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镇压，这是一种假夺权。有的地方坏人没有上台，但在背后牵线，挑动那些青年去夺权，夺了权以后就镇压革命派，这些单位的青年同志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决不允许权落在坏人手里，凡是被坏人假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搞反夺权，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要搞反夺权，把权夺过来。

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三结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攻击革命造反派。

决不允许利用“三结合”，把一切恢复到老样子，该打倒的一小撮坏人（就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倒。

上面这两种倾向，在整风当中主要解决那一种，由各单位自己判断。因为情况很复杂，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希望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能够逐步地，但是尽快地把各级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切领导班子，都要有军队或民兵代表参加。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加强三性，一定要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出发，要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发，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性已经足够了，就是一个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前一时期曾经谈到，有一些红卫兵的战士因为在大风浪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革命精神好像不大足了。无产阶级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永远要发扬。我们这次会议不是也念《语录》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的决心永远要保持。我们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要准备打退几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这一句话也不能曲解，决不是为了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小

团体利益去争取胜利，那就变成坚持错误了。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保持我们的革命性，发扬我们的革命性，一切消极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抬不起头的情绪都要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掌握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斗争，继续大大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首创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来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斗出来的、创出来的。

在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是关系到我们不能再革命下去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把权夺过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过，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后来果然如毛主席这个话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夺权，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月革命的英雄们，战士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说这个话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虽然我在一月革命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被捧场、被胜利、被讨好、被权力、特别不要被物质享受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永远不管怎么忙，永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进城的时候是革命者，后来就蜕化变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教训。

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时就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加强无产阶级的

科学性。主要是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什么科学性也说不上，调查研究也做不好。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阶级分析。这不是个人问题，要进行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跌跟斗。现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认真钻研，用毛泽东思想去做调查研究，甚至于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吃饭，凭这个去判断风向，这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前一个时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听途说的新闻去投机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跌了大跟斗，就是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性。我们希望各革命组织之间不要搞情报，不要用相互打到的别组织内部去搞情报的办法，不要搞这个东西。要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原则斗争。同志之间要学会商量问题的作风，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商量、要辩论。辩论我是赞成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听到一个学校里，一会儿这一派上去辩论，一会儿那一派上去辩论。要辩论，不要用打、用砸、用抢等办法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股歪风要坚决煞住。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当中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要掌握起这个武器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出发。不要搞投机。

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要坚决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反毛

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错误意见，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今后还是这样。反对奴隶主义，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本来是要我们去反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要盲从。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反对奴隶主义，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奴隶。但是有的人后来歪曲了反对奴隶主义，解释成怀疑一切，这样就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于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我们要巩固劳动纪律，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秩序，坚决反对无故缺勤脱产等等妨碍生产的现象。有的工厂里脱产缺勤率太多这个现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们希望中小学的同学要回校去进行学习、整风，不要不愿意回去、老是在外面游逛。要加强保密观念，现在有些同志头脑里保密观念很少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在窃取我们的机密。我们还有个保密观念，反对泄密的现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坚持。各革命组织当中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对没有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

这里顺带说一个整顿组织的问题。不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除了指出要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按部门建设我们的阶级队伍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有一些违反中央指示的组织要主动解散。我们希望这一些组织，能自觉地回到本部门去，参加本部门的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条就是这样说的，“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事实说明某一些革命组织当中

因为相互不了解，确实混进了少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坏人混进了革命组织，盗用革命组织的名义干了坏事，这些人我们应当通过整风把他们揭露出来，清洗出去。当然我们这里要有区别，一个组织里面有了坏人，假使他不在领导地位的话，就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里面有了坏人，那么一定要把他同广大的战士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这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洗出去之后（这是极少数人），我们的革命组织就能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有力地去战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阴谋诡计。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讲这样四句话。同志们，我们刚刚《语录》已经念过了，这一次整风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定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提高政治觉悟着手，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着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首先我们要学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决议中规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关指示，和红旗杂志有关的社论。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学校里传达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特别要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样，这是一篇万古长青的伟大著作，如果把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来建设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可以象当年毛主席把军队建设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拿这个建军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使我们真正的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整风才有武器，才有标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要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也需要开一些小会，深入地辩论某些思想问题。有的还需要个别谈话，现在我们个别谈话，已经很少很少了。解开一些思想疙瘩，有时还需要个别谈话的。一个单位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如果大家都争论不休，而又找不出什么原则分歧来，那么各个革命组织就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大家首先检查自己。要多看到别的同志的优点，要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像鲁迅兵团东方红造反派的小将那样，对于错误的思想要作透彻的批判。什么“材料挂帅”啦，“单纯军事观点”啦，“罢官革命”啦，“贪图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彻。对待错误思想要批判得透，但是对于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不是像水浒传里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管你是什么人统统砍，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要摆事实讲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账。不要由远到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翻起，一直翻下来。这样辩到哪一天啊！还是着重解决当前的问题。对待革命的同志，我们要坦白、诚恳、严肃，有话当面讲，不搞背后活动。要注意

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们现在来讲大的方面是什么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掌握得对不对呀？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究竟怎么样呀？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人人变得什么事也不敢干了，那还行吗？你要干革命，总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坚决改，这个就是好同志。

要边战斗边整风，不是停下战斗。这里对于战斗也要解释一下，据说有的学校叫边战斗、边整风，战斗就是打内战，就是革命组织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这个意思。边战斗边整风，就是指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说要脱离当前的工作。这里工厂和学校不同，因为工厂要坚持生产，中学和大学不同，工厂、学校又和机关不同，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在时间上要作适当的安排，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在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毛主席指出：我们在分析问题、分析错误的时候，“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经验教训。毛主席还说，在一般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搞什么人人过关。比如小团体主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看当时成立这样那样革命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当前的形势下，跨行业、跨部门的小团体和工作不适应。在看到这一些不适应的时候，要看到客观上怎

么障碍了我们的工作，也要看到我们主观上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障碍，这样子分析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学校里对一般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这个阶段或者那个阶段，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当从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着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这样，那些什么“联动”之类反革命组织就彻底孤立了，他要挑拨离间就不能实现了。

总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帜鲜明，对于同志要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说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反对风头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上海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们在一月革命当中曾经有过光辉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我们满足起来，不继续前进，我们就会落后，如果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的光辉传统，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组织阶级队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大大地前进一步。一句话，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

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放眼
看全国，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
定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个红色堡垒，在任何逆流
歪风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张春桥

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

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 and 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竟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

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 29 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 "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 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青年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

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

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

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

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 " 三结合 " 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

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

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

（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

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那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反革命。反革命总是有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

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那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十个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竟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

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通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

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查，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大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罗！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

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个有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录音坏了）那到不见得。比如说他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要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

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们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

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只发了个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似应为“都一样”——编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

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竟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一了，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

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之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大联合，三结合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崇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吗！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行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哪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

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军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己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他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

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对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竟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

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的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江 青

为人民立新功

(1967 年 4 月 12 日江青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

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

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

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讪，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说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

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讻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

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

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

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

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

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

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

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 1964 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

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

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姚文元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塌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

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人，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

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

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

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鍾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

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

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

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

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

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珂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珂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

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恶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

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要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

“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

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

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

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

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恶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

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

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

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

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

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

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

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

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的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

“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

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

“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

什么“有些人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

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

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

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蓬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姚文元

评陶铸的两本书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毛主席批示：

好极，此文的要害是点破了“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

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

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

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

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

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

“‘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

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

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

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

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

矛盾的统一体。”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

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

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一九六〇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

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

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

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

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

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

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

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红旗》1967年14期

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

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

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

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置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個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

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红旗》一九六八年二期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作政治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

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

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

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2))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

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

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

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

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

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

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2)(3)）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

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

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

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

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

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

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3)(4)）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

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

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

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

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

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

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4)(5)）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

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

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

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宣言》）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

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

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緬

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持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

我的一点意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

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 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

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

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

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

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与斯诺的谈话 - 关于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

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

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

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

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噏！噏！噏！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

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Island 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

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 GreatLeader, GreatSupremeCommander, 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 [法律和秩序] 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 [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 [秩序]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

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

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泽东：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

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

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 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 O 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张春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二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

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

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

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 380 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

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

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

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海里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

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

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

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王洪文

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

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

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

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姚文元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

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

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

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 unlimited 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

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 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

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止境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

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

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

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

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

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

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

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张春桥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早在 1920 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

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

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

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

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

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

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

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于《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王洪文

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

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逐字逐句地领会，主席的指示我也领会不深，到主席那里问了几次。主席作了解释。现在我还领会不深。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深刻发挥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席指示告诉我们，既要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又要搞好经济领域里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全党的任务。

主席几段指示，第一段是纲，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段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条件；第三段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关系中，指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对这几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主席再三讲明白的，还不能说我理解那样深透。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提到列宁而未提到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人问什么叫精髓）。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

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抽掉，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但马、恩也只有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践经验也不多（指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法权无深刻认识，一九三六年提出消灭阶级，这个理论上的错误不小，后来有所认识，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他宣布阶级没有了，但还是抓了阶级斗争，比如斗了几个主要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白俄罗斯反革命叛乱坚决镇压了。他有了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著作多；（二）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面临的任務更实际，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七年经验；（三）列宁对第二国际叛徒考茨基的斗争很尖锐，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所以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列宁，而未提马、恩，是因为列宁捍卫、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提列宁，而未提马、恩，并不是马、恩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多，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不好，不清楚就问嘛！我也想追根，找了主席好几次，哪些问题要搞清楚呢？如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经济制度中，有无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怎样限制；对经济基础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说搞不好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就讲这些，不讲这些东

西，无产阶级专政就讲不清楚。理论上糊涂，行动上必然盲目，这就是主席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全国人民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劳动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阶级，这就是压迫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主席讲了有差别，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所有制变了即国家政权阶级性质变了，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关系变了，劳动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主席指示精神强调是没有多少差别，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列宁讲了这么一句：**“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样的。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是私有制，或者叫核心。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它的阶级内容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个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如有按劳分配，一来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二来是资产阶级法权。说它是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消灭了剥削，这就和资本主义不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又分成了等级，事实上不平等，与旧社会差不多。从本质上看，主要从分配的等级制度沿袭了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资产阶级法权的特点、特征是等级制。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什么要加以限制？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又清楚又不清楚。主席叫我想想自己，我又比较清楚了。从反面看，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苏修工资差距大，实行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就是这样产生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从正面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巩固，有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给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还没有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如不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扩大、自由泛滥起来，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进而发展资本主义。主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苏修那一套搞不得。刘少奇搞了危险很大，林彪也很积极的想利用这个东西发展资本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主席讲这个，是主席预言林彪一类还要出来，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为什么？鉴于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我们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教训，回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就清楚了。所以，主席说**“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如果不弄清理论上的问题，这些现象就搞不清楚。

主席为什么引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列宁这段话，是小生产未进入集体农庄情况下讲的，现在我国已集体化是否适用？我体会主席引用列宁这段话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因为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没有看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巨大影响，

主席提出这段话，说明了列宁的论断没有过时。那么，列宁的这段话是否符合我国的情况，主席反复讲了符合的理由，（一）我们有个体生产的残余；（二）小生产包括原来个体生产的农民，他们是从小生产过来的，小生产固有的特点还存在，自私性(注黄冈版作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清楚得多，原来道理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主席这个指示，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在小生产后面讲这个？主席说，你想想你们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是从哪个阶级来的罗！难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主席这个指示，是从分析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现实阶级斗争情况提出来的，是对列宁思想的重大发展，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资本主义复辟有阶级性，不仅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领导阶级、先锋队内部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无区别？我的理解，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一部分雇农，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指的范围更广泛些；（二）资产阶级作风是多方面的，反映政治、思想、经济各方面各条战线；（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非常广泛，影响到个人变质、国家变修，影响到下一代。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次我才搞清楚，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植人

们贪图享受的，搞特殊、脱离群众，它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因素。

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就是从思想上、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不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就会变修正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尖锐、肯定地提出的科学论断；

（二）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这是主席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讲了，斯大林没有讲，主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四）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产生资产阶级的情况。这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专政范围给予新的内容。

现在发表了“三十三条语录”，毛主席看过好几遍。主席说：“有两条顺序要颠倒一下，增加几条很好。”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无产阶级最基本的东西，有了这个纲，读书就开了路。

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一分为二，即要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不能让它扩大、发展、自由泛滥。你肯定过了头，过于扩大它的作用，还要不要共产主义？不要一分为二批过了头，把它说成很坏很坏，似乎马上取消，你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一分为二辩证

地看。三十三条主席看过的，它的顺序安排，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打乱就不好，重复可以，条条都有侧重点，看你怎么领会。

语录是按主席指示顺序编的，所以说它是完整的体系，为了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是根据主席四段指示选编的。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讲“语录”，“语录”虽未分标题，一看结构很清楚，就是主席几段话，应该分四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学习问题”。讲后面几个问题，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后面几个问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阐明。开始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有个学习、领会过程，有个深化过程，不要怕讲，大家都来讲，认识就深化了，再认识，再总结，再认识，再深化。

有人说，只要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条件，但能否产生资本主义，是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不在资产阶级法权本身，资产阶级法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在革命路线指引下，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种情况，在受资本主义侵袭的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面前，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泛滥、产生资本主义。所以说，重点决定的是路线、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要讲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它的消极作用。这是向前看的，向共产主义看的，必须限制，要引导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看点马、列的书，强调提高三个觉悟，对共产主义除了消灭阶级这个问题以外，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物质；二是共产主义觉悟。没有这两个条件，“按需分配”是不能实现的。

我已经讲了“语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你颠倒就不利于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围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顺序选编和安排的。

有的同志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的不要勉强，从实际出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讲不清楚就再学再讲，不要被讲不清楚束缚手脚。不讲不行，全国人民怎么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要乱讲、乱解释，实事求是。当然，这样讲不要怕讲，第一次讲错了，第二次纠正就深化了。不学，哪个讲的清楚。

录入自《学习理论讲话》，甘肃师范翻印，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

张春桥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红旗》杂志 1976 年第四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叁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崇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

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活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 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

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

独立 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

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

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其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

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于《红旗》杂志 1976 年第四期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报告中央。

此件不准翻印、传抄、张贴，不广播、不登报。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毛泽东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
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

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

论反对修正主义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是唯一的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退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的从共产党内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

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间的收入差距扶持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退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修改》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了……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后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的政策。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成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

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有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么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社会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全部的政策中所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册第四百零八页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同中央代表团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如果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审阅中央统战部一个文件时加写的一段话》一九六四年一月

如果我们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毛主席谈批孔》

一九七三年九月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九月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人民日报》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占人口总数 90%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他，他们总会逐步的觉醒过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顽固的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

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革命，在他们认识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和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九七六年九月）

选自上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五篇第十四章，其中的立场和观点主要归功于毛主席，次要归功于张春桥。

无产阶级为了胜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使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削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曾经作过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列宁也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它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半途而废。

为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了起来。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

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列宁总是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决不能中途停止。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号召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唯一正确的路线。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我国人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率下，遵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在斗争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反复的较量，广大革命群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伙叛徒、卖国贼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形式的斗争，直至把一切毒蛇猛兽消灭干净，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显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原形。苏修叛徒集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全民国家”。这种谬论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于国家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科学论断。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掩护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懂得资产阶级在哪里，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江 青

我的一点看法

(1980 年江青同志在反革命叛徒设立的“特别法庭”上的声明)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暗中嫁祸他人。 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洗刷臭名。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说：) “我对他(公诉人江文)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

抬不起头来。”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然后，她说：）“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然后，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后接着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

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然后，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江青的发言再次被打断。然后，她说：）“毛主席早就对我说

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而成为现实。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江青的发言又一次被打断。然后，江青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江青的发言被打断之后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了。然后，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又说：）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Edith B

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理 论是对马列毛主义的重要贡献

近期，一些迄今尚未公开的中共内部文件的出版，使人们对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终贡献——尤其是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在 1976 年初，毛泽东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尽管这个理论之前是已知的，但包含它的整个文件却并不为人所知。此外，许多中文出版并推行的相关文件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们从未被从中文翻译过来，并在 1976 年 10 月的国家政变后被走资派镇压取缔。

随着这些文件的发布，有必要重拾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研究。这些文件揭示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列毛主义的最后贡献。掌握了这个理论，就有可能了解整个 20 世纪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

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毛泽东发挥他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该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创性的和质的新发展。本质上，毛泽东是在说，在资产阶级大体被击败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没有说走资派——即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出现在党和国家内部——他只是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要怎么理解？作为客观的经济事实这与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息息相关。在研究它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之前，让我们先研究一下该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卡尔·马克思在 1852 年指出：

“……无产阶级越来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是不断革命的宣言，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通向普遍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它们赖以生存的全部生产关系、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对应的全部社会关系，为的是这些社会关系派生的全部思想的革命化。”

这一重要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这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什么是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永久的（即不间断的）革命，直至达到一个没有私人财产、国家和父权制的社会。要达到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废除全部阶级差别，废除它们所依赖的全部生产关系，废除全部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全部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观念。这“四个全部”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原则，这意味着实际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

在马克思对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论战中，他在长篇大论中指出了如何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基于上述的“四个全部”的变形的逐渐的过程。马克思写道：

“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正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在经济上、道德上还是思想上，它在各个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胎记。相应地，个体生产者（在必要的扣除之后）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正是他们给予社会的東西。他们给予的是他们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工作日由个人日工作时间的总和构成；个体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是由他们所贡献的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份额。他们从社会获得证明，证明他们提供了某某数量的劳动力（在扣除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共同基金之后）；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从消费资料的社会存量中取得与同等数量劳动力成本一样多的东西。他们以一种形式提供给社会的同等数量的劳动，又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回报。

这里显然与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相同，因为是等价交换。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除了他们的劳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给予，又因为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移给个人所有。但就后者在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与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相同：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与另一形式的等量劳动交换。

因此，这里的平等权利仍是按资产阶级法权原则，虽然原则和实践不再对立，而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交换只是普遍存在，而不是个别地存在。

尽管取得了这种进步，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不断受到资产阶级残余的污名化。生产者的权利与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平等在于是以平等的标准为尺度，即劳动。

但一个人在身体或精神上优于另一个人，相同的时间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可以劳动更长的时间；而劳动，作为衡量的尺度，必须由它的持续时间或强度来定义，否则它就不再是衡量的标准。这平等的权利是不平等劳动的不平等权利。它不承认阶级差异，因为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工人；但它默认不平等的个人禀赋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平等的生产能力是一种天然的特权。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就像任何权利一样。就其本质而言，只适用于平等的标准；但是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他们就不会是不同的个体）只能用一个平等的标准来衡量，在此他们被置于一个平等

的观点之下，只从一个确定的方面来看——例如，在目前情况下，仅被视为工人，从他们身上看不见其他东西，其他一切都被忽略了。进一步讲，一位工人已婚，另一位未婚；一个人的孩子比另一个人多，以此类推。因此，在劳动能力平等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基金也平等，但一个人会在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得到更多，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更富有等等。为了避免所有这些缺陷，权利必须是不平等的，而不是平等的。

但这些缺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阵痛之后刚刚诞生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前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以其为条件的文化发展状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个人从属于劳动分工的奴役地位及因其产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现象已经消失了。在劳动不仅成为一种生存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所有合作财富的泉源都更加充沛地流淌之后，只有那时，才能全面跨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视野，让社会在它的旗帜上镌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仍有上述“四个全部”的残余。其结果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存在，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被淘汰。因此，国家（state）也继续存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由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建立在维护这种真正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的国家！列宁指出：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作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并未完全废除，而只是部分废除，仅在迄今实现的经济革命部分，即仅在生产资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承认它们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将它们转化为共同财产。在那个范围内——也只是在那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消失了。

但是，就其它部分而言，它仍然存在；它在产品分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中仍占据调节者（决定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经实现；另一个社会主义原则：‘等量劳动换等量产品’也已经实现。但这还不是共产主义，它还没有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它给予不平等的个人以不平等的（真正的不平等）劳动量、等量的产品。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陷’，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沉迷于乌托邦，我们就不能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后，人们能立即学会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为社会工作。此外，废除资本主义并没有立即为这种变化创造经济前提。

此时，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再没有别的规则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仍需要一个国家，它在保障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的同时，保障劳动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只要不再有任何资本家、任何阶级，以及不再有阶级被镇压，国家就会消亡。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仍保留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它使实际的不平等神圣化。想要国家彻底消亡，就需要彻底的共产主义。

……

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领会恩格斯无情地嘲弄使‘自由’和‘国家’这两个词结合起来的荒谬言论的正确性。只要国家存在就没有自由。有自由就没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这种状态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因此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根源之一也消失了——此外，所谓根源，仅仅通过将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财产、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即消除的。

……

在它的第一时期，或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成熟，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残余。因此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其第一阶段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有趣现象。当然，有关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能够强制执行法律规则的机构，法权就什么都不是。

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也
不仅保有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有资产阶级国家！”

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必定存在，在“四个全部”逐渐废除并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定存在一个国家——列宁

称之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为了在恰当的语境中把握这个理论，我们必须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社会在两条道路上斗争——马克思称之为“不断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只是向消灭一切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正如毛泽东正确指出的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受到限制。”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政权内部产生和持续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那么它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剥削。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工人的工资是根据他们的贡献，再“扣除他们为共同基金所付出的劳动”，即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从劳动过程中提取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之后。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强调了巴黎公社缩减这部分“共同基金”的决定，并延伸至把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限制）。马克思写道：

“警察不再继续充当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是立即被剥夺了政治属性，变成了负责的、随时可以撤销的公社的代理人。行政部门的其他所有官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往下，公共服务的酬劳数额必须与工人工资的数额同等。国家高官的既得利益和特殊津贴随着高官本身

的消失而消失。公共职能不再作为工具为政府私有。不仅市政当局，而且迄今为止由国家行使的全部职权都将交到公社手中。”

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时就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列宁说过：‘小生产不断地、每天、每小时、自发地、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也发生在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党员中。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

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来自马克思所说的“共同基金”。这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些工资不是对生产性劳动所产生价值的回报——回报来源于产生的价值——而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这是一种小生产形式，正如列宁所说，“产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仅在整个社会，而且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不断产生出来。

这显然构成了一种剥削形式。客观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机构的有偿工作人员——作为经济范畴——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精髓所在。该理论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资本家。毛在上面的引文中还指出：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

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什么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呢？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道：

“此外，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放弃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采取的某些其它概念——马克思关注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人为地应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关系。我指的是诸如‘必要’和‘剩余’劳动、‘必要’和‘剩余’产品、‘必要’和‘剩余’时间这样的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阐明剥削工人阶级的根源——剩余价值——并武装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智力武器。马克思使用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关系的概念（范畴）是很自然的。但至少可以说，现在使用这些概念是很奇怪的，因为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失去权力和生产资料，相反，拥有权力并控制生产资料。现在，在我们的制度下，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或者‘雇佣’工人听起来是相当荒谬的：好像拥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雇佣自己，把劳动力卖给自己。现在谈论‘必要’和‘剩余’劳动同样奇怪：好像在我们的条件下，工人为扩大生产、促进教育和公共卫生、组织国防等等贡献的劳动，对于现在掌权的工人阶级不是必须的，不是为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所必须的。

应当指出，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研究的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其中，马克思承认劳动对社会的

贡献是为了扩大生产、教育及公共卫生、行政开支、建立储备等等，与为满足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所花费的劳动力一样必要。”

这仅在一方面是正确的。正如列宁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的那样，“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作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并未完全废除，而只是部分废除，仅在迄今实现的经济革命部分，即仅在生产资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承认它们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将它们转化为共同财产。在那个范围内——也只是在那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消失了。”因此，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工人身上提取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服务等形式返还给他们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支付非生产性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报酬方面，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这仍然是一种剥削。而且，它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总而言之，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从工人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在客观上是所有这些人所属的经济范畴，也包括左派成员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样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如毛正确指出的，只有走资派才是。对于左派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和恩格斯类似的情况，他是旧资产阶级的成员，但终生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因此，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党内资产阶级”一词只用来指走资派，而不指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是

有道理的——但作为一个经济术语，把所有人员都归为资本家是必要的。为的是把握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这个理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争议，但我不这么认为。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贵族作了同样的观察。他指出，政党、工会和其它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资产阶级以百万种不同的方式收买。这构成了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社会爱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职业革命者的报酬是由党费及党以其它形式获得的利润支付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防止机会主义在这样一个党内出现的第一步——忽视它必然导致机会主义的胜利。

最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仅是党和国家机器内部的小生产，还有一般的小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也在党和国家机器之外不断出现。这些新的资本主义成分代表的是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党内资产阶级则代表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由此可见在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几十年里，社会-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哪种资本主“影响”将在那里建立。在苏联，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赢了，但在中国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当然，这两个派别相互勾结，相互争斗，必须强调的是，它们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是相互帮助的。例如，刘少奇推动了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新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政治为中心。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只能通过与“四个全部”的长期斗争来改变，不

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是要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上。

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必须以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中心

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对它的限制，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巩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的本质。毛泽东指出：

“我国目前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的，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受到限制。所以要是林彪这样的人上台了，推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容易的。因此，我们应该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

毛泽东在这段引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只能通过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逐渐巩固，而资本主义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恢复。事实上，这“是很容易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确实在 1976 年夏秋短短几个月就复辟了。1976 年 10 月的国家政变只是这个过程的高潮。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指出：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我的见解与某些人是冲突的，如 (Deng-yuan Hsu)、金宝瑜等，他们不明白党内资产阶级问题。例如，他们说“1949 年到 1978 年的过渡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自 1979 年的改革逆转了过渡的方向”。因此在他们看来，直到 1978 年华国锋下台，社会主义道

路一直在走。这与毛泽东的理论背道而驰，因为重点在于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生产关系。正如毛泽东在 1969 年指出的那样：

“显然，我们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的基础并不牢固。据我的观察，恐怕在相当大部分的工厂——我不是指全部或绝大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中。并不是说工厂的干部里没有好人。曾经有。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和支部书记里曾经有好人。但他们走的是刘少奇的路线，只靠物质激励，以利益为主导而不是推无产阶级政策，发红包等等……但工厂里确实有坏人……这表明革命仍未完成。”

这指引我们不再关注所有制，而是关注领导权问题——哪个阶级在领导所有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受到限制还是扩大了？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斗争的本质。这与上面两位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无关。张春桥指出：

“毛主席的讲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在所有制问题上，和其它一切问题一样，我们不仅要注意形式，还要注意它的实质内容。人们充分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重视所有制问题是仅在形式上解决还是在实质上解决，不重视对所有制有反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另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形式——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两个方面和上层建筑在给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以及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决定了哪个阶级事实上拥有这些工

厂。同志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官僚资本或国家资本所有的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的。我们不是派军管代表或者国家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改造吗？历史上所有制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都先于夺取政权，然后再利用政权来实现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巩固和发展新的制度。不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自然产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如此。官僚资本控制着旧中国 80%的工业，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之后，才能改造并为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先于夺取领导权和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就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改变苏联所有制的方式吗？这不就是刘少奇和林彪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些工厂和其它企业性质的方式吗？”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走社会主义，必须围绕上层建筑问题。就是说，必须看指导党和国家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华国锋的路线是扩大而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华国锋提出了“原地踏步”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在谈到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时，华国锋说：

“在全国建设大寨县，就是让中国每个县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全力建设社会主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

在这里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安定团结”。但对这个修正主义人物来说，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意味着什么呢？他进一步表示：

“这意味着各县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食为纲，全面发展’使粮食、棉花、油料、生猪、各种经济作

物和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的产量超过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和国家计划的指标。我们要使农业现代化更加有力地推动和保障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大大增强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备战抗灾的物质基础。”

学大寨的问题，根本上是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江青在华国峰发言的同一场会议上的立场与他的路线完全冲突。她说：

“现在全国农业生产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可以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自然灾害是可以克服的。国内不是出现了很多红旗渠吗？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们战胜旱灾的最好证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复辟是很危险的，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有害影响已经彻底消除（编者注：即表面的、明显的影响）。有报告说在部分生产还存在着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政策。（扩大自用地块，扩大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实行分户定产）。是不是很奇怪？根据我们江西同志的报告，该省的一些县对中央的农业政策认识不够。他们疑虑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里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可行性。这种保守态度的出现也是农业发展的绊脚石。同样，有些同志在对中央的报告中质疑靠农业银行发展农业经济的可行性。在此奉劝大家，一切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都要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而不是依靠农业信贷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争取更大的成就，这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自力更生，我们才能战胜困难。”

毛泽东指出，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式发展，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纲。他说：

“如果社会主义不占领农村战线，资本主义肯定会。是否有可能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道路？”

华国锋提出的路线，正是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所说的“原地踏步”——忽视阶级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毛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一切都是目。

.....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Rethinking Socialism》一书的作者（编者注：金宝瑜女士）围绕所有制问题，而不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问题，最终站到了支持华国锋修正主义的立场上。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从何而来？它与华国锋一起上台。Hsu 和金到底反思的是马列毛主义原理。其他不理解毛泽东最终理论的人也是如此。

在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走资派取得政权后复辟的，而不是在旧的所有制复辟后。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发生在 1976 年，并以 10 月的政变告终。早在 1973 年 8 月的第十次党代会就是它的预演，周恩来领导了一批走资派重新掌权。最迟在 1976 年 6 月，毛泽东就指出，走资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在写给江青的《遗嘱》中，他写道：

“不妥协是好的。

如果刀刃转向，我相信它已经转了，来反对革命，

那就要再次发动游击战。

再一次，延安……”

这里所说的“妥协”，是指与走资派及其同盟者中间派妥协。此前，毛泽东曾在 1975 年 5 月批评江青和张春桥孤立自己，不争取中央多数，而是作为“四人帮”。这种宗派主义做法导致右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获胜，此时“刀刃（转向）反对革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立即“再次发动游击战”稍后我将回到这个关键点。现在，我只想说，这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观点，即走资派已经在 1976 年 5 月掌权，他们只需逮捕左派领导人来“正式化”他们的权力攫取。

现在要着手解决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如何进行的？

资产阶级权利如何受到限制？这个限制的进程不可能比“四个全部”的改造进程更快。张春桥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转向修正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放弃对我们的侵略和颠覆，不仅因为中国的老地主和资本家还在，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而且因为新的资产阶级成分‘每日每时都在产生’，正如列宁所讲。

……

我们常说所有权问题“基本解决了”；这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废除。上述统计表明，

私有制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仍部分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而是包括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中还比较薄弱。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的消失，意味着一切生产资料都转化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显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忽视摆在我们面前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领导权的任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即究竟是哪个阶级在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掌握所有权的问题。”

这个论点是完全可取的。它为如何在非国有部门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启示——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将所有财产逐步转变为全民财产。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内部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仍然存在。毕竟，作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每天每时都在产生”，“大官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源头。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而不是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

让我们从要采取的初步措施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剥削性工资必须立即降低到“工人工资水平”。这是底线。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正在我们的苏维埃政府雇员中产生……”

“在苏维埃工程师、苏维埃学校教师和享有特权的，即最熟练和条件最好的苏维埃工厂工人中，我们观察到资产阶级议会制所特有的

所有负面特征都在不断复兴，我们只有通过不懈的、持续的、长期的和持久的斗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才能逐渐战胜这种邪恶。”

此外，必须通过使这些工作人员参与生产性劳动来限制这种剥削因素。毛泽东指出：

“必须保持干部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工人，而不是骑在人民身上的霸主。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与劳动人民保持广泛的、持续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重大举措；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这些措施——降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至普通劳动者水平，并让这些工作人员参与生产性劳动——将作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基本限制。但是，这些还不够。为了消灭国家（state）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消灭国家本身，使其逐步消亡。列宁指出：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需要的那种国家，其政府机构是警察部队、军队和官僚机构（官僚作风），脱离人民并与人民对立。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是完善了这个国家机器，只是将它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的手中。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如果想维护当前革命的成果并继续前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就必须‘粉碎’——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并通过使警察部队、军队和官僚机构与全体武装的人民合并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沿着 1871 年巴黎公社和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明的道路，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和武装所有贫穷的、

被剥削的人口，以便他们自己（受压迫者）直接将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构成这些国家权力机关。”

他还指出：

“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要将苏维埃成员变成‘议会议员’，或者变成官僚。我们必须通过让苏维埃所有成员参与实际的行政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部门正逐渐与人民委员会合并。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贫困人口参与到实际的行政工作中去，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越多样化越好——都应该仔细记录、研究、系统化，通过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并体现在法律上。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每一个劳动者在完成了八小时的生产性劳动‘任务’后，无偿履行国家（state）职责——这个过渡特别困难，但只有这个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劳动人民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行政、警务和国防的职能，直至消除官僚、警察和常备军。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武装的无产阶级本身将构成国家。但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比“四个全部”的改造更快。因此，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既能推动“四个全部”的改造，又能推动国家消亡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办法就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贡萨罗（Gonzalo）同志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毛主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先验的方面；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重大且悬而

未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政治进程和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发展的里程碑，具体体现在革命委员会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有如此重要的贡献，是因为它是实现废除“四个全部”和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手段。正如中国共产党指出的那样：

“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动人心的伟大革命，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更广更深阶段。

……

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仍企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俘获他们的头脑，企图卷土重来。无产阶级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必须正面迎接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每一次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造教育、文艺和所有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党还指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全党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

级反动立场，彻底批驳学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同时要对那些潜入党、政府、军队和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批判和否定，将其清除或转调其它职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指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委托给这些人。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做过并且还在做这类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

那些潜入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识破了，另一些还没有。有些人仍受到我们的信任，作为继任者受到训练，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仍安坐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消灭走资派不是文革的目的，只是方法。目的是“改造灵魂”，正如他指出的那样：

“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铲除修正主义根源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最及时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经过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总结了以下经验：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

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巩固时期和跃进时期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断革命”的具体表现，其最终结果是“四个全部”的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瓦解，国家的消亡，以实现全体武装人民的自治、父权制的破灭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完全和彻底消除——总之，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唯一的共产主义法权支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四、资本主义复辟无法阻止，

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反复辟加以否定

由此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取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被限制还是扩大。共产主义道路对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资本主义道路则是扩大或在问题上“停滞不前”。只要资产阶级法权不再受到积极限制，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

“如果中国发生右倾反共政变，我的结论是他们不会得到安宁，而且很可能是昙花一现。这是因为所有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都不会容忍。到那时，右派可能会用我的话来巩固一段时间的权力，然后左派肯定会用我的其他话，组织起来，打败右派。”

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通过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但重点是，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期间确实进行了，而资本主义还是复辟了，可见单有文化革命是不够的。贡萨罗同志指出：

“1976 年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明明是复辟与反复辟之争的一部分，相反，它向我们展示了先验的有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向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中的重要性。”

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但是，文化革命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这个过程（复辟 ↔ 反复辟）仍在全世界每个国家进行着。如果走资派在社会主义国家上台，他们就会立即谋求对共产主义者发动法西斯政变，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关键是一旦资产阶级法权不再受到限制（左派）就要立即夺取政权。这是毛在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做的。毛指出：

“夺权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是新的创造……我们已经夺取了权力，但它可能被再次从我们手中夺走……但我们必须保持住权力。这主要取决于左派的力量。当左派虚弱时，权力可能被再次夺走。因此，左派必须强大。我支持权力斗争。”

然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尚未能够对毛进行反革命政变，而是将他从所有政治权力位置撤职，只留下他担任共产党主席。他利用这个职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在 1976 年，

当时江青和张春桥都还未被选入党和国家的负责职位，华国锋假借召开拟选举他们分别为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逮捕他们及其支持者。我引用过的毛泽东留给江青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预言了这种情况。因此，江青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毛写道：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革命是无止境的。
在过去十年的斗争中，我竭力使革命达到顶峰，
但我失败了。
而你可以。
如果失败了，
你会坠入无尽深渊。
你会粉身碎骨。”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控制，江青将被迫发动一场人民战争以夺取政权，正如毛指示她做的那样。然而，她并没有履行这个指示。结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必须从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吸取教训，即：

1、资产阶级法权一旦不再受到积极限制，就意味着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

2、党内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积极进行社会-法西斯国家政变并复辟资本主义。

3、没有政治权力，无产阶级就不能以文化革命为手段夺回政权。必须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

因此我强调贡萨罗同志关于“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理论的重要性，这是他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贡萨罗指出：

“通过党的军事化，我们向社会的军事化迈出了一步，这是在战略层面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军事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海洋，它保卫着对权力的掌握，一旦取得就保卫它。我们参考中国革命的经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经验，那里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一切都从枪杆子里出来：党、军队、国家、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我们就这样发展了战争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武装群众，直到全面武装人民。当这个目标达到时，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剥削。”

我们应该将普遍武装人民理解为一种必要。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必须经过一段群众的动员、政治化和组织化时期。因此，这项政策的实施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国家消亡息息相关。人民武装为国家消亡提供军事基础。而且，它为社会主义反复辟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提供军事基础。

党内资产阶级一旦夺权并准备发动社会-法西斯政变，左派就有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短暂窗口期。在中国是 1976 年 10 月以前，而在苏联是在 1956 年党的二十大之前。在这两种情况下，左派（在中国以江青为代表，在苏联以莫洛托夫为代表）在政变之后采取行动为时已晚。

党内资产阶级一旦掌权，也就控制了人民军队。因此，它可以并且会用它来复辟资本主义。这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民兵的重要性，民兵可以由人民军队动员，但只接受地方机关下级共产党员的命令，因为动员民兵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在这短暂的窗口期，共产党领导人有可能号召全党左翼、人民军队的左派特别是民兵左派，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装斗争中来。不可避免地，只有党、武装部队和民兵中的部分会加入左派——但是，这样做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反复辟打下基础。

人民战争一旦因此重新发动，就可以通过长期的持久革命战争，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许多原本支持走资派的党和军队及国家机关的人员转到社会主义反复辟的一方。遵循这个战略、这条道路并且只有这条道路，才能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否则，资本主义将会完全复辟，该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将发现自己在一个社会-法西斯国家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要工作更长时间。只有走这条路，上述毛泽东同志对修正主义国家的预言才能成真。

五、结论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列毛主义的最终贡献，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它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人民的普遍武装、反对“四个全部”的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延续的资本主义复辟与社会主义反复辟斗争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所有共产主义者以及所有想革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先验重要性的理论。

如果不把握这个理论及其各个方面，及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意义，就不可能进行不间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掌握这个理论之前，无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付出多少努力，流多少鲜血，资本主义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复辟。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该理论是绝对必要的。

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公开的法西斯国家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否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社会-法西斯国家工作的同志们也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自己必须走的出路。全世界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因为只有理解它才能将我们带向共产主义。有了这种理解，就会如贡萨罗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们注定要赢！



继续革命著作选读

学生读本

*

斗私批修出版社

斗私批修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2年9月第四版（上海），202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册

每册：5.0元

